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5年02月刊

总第78期

**P26 专题聚焦：**

**杨宗凯：以数字化夯实教育强国基点**

杨宗凯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 01 新时代全面建成教育强国的指导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周洪宇

## 专题聚焦：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突破与数字化赋能

- 26 以数字化夯实教育强国基点 杨宗凯  
29 重塑未来——教育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突破性  
意义 袁振国  
43 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 孙杰远  
54 以评价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周光礼

## 专题研究：教育创新与实践探索

- 68 书院治理的中国模式与历史经验 中国昌  
84 多措并举提高教师培训质量 付卫东  
87 疗愈与生活：海洋叙事的教育意蕴 刘训华

## 数说前研

- 101 盘点了147所“双一流”高校后，我们发现毕业于这  
所高校的“一把手”最多 一读 EDU

## 院内动态

- 111 周洪宇院长语录入选2024年百度指数最强的21位  
教育名家金句榜  
112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英文版正式在海外出版



欢迎与我们互动

## 新时代全面建成教育强国的指导思想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来源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



###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大会重点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会议集中关注教育强国建设，体现了对教育强国建设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统一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定位、新论断、新部署，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一、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新论述，彰显了教育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价值，深化了对教育功能、教育属性和建设教育强国的认识。

### （一）教育功能的新定位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教育定位提出的新论述，强调教育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教育强国写入党代会报告，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关于教育功能的定位是，“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考虑，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实际上是对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进一步落实。

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功能的定位经历了不断发展和凝练的过程，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主要从教育的具体作用的角度出发，论述教育对提高人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提出教育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为本次教育大会所做的新概括奠定了基础。此后，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考虑，认为三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表述更直接、更明确、更简明，也更深刻。

首先，一个“基”字，将教育的战略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教育作为整个国家发展全局的基础，而不是简单的组成部分，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担当。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一语双关，即教育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并用更加简练的语言概括。其次，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也标志着对教育的内部系统与教育的外部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一新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思考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和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进而要求形成新的适应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内外部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经济、文化、军队、外交、法治工作一样，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根基和基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概括为思想体系的战略前提已经具备。

## （二）教育属性的新定位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

论述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并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怎么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本道路，其核心是“九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则将关于教育属性的表述调整为：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将民生属性调整为人民属性，并将其放在政治属性之后、战略属性之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人民立场与战略思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总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经验的新认识，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本质属性的提炼和概括，更是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的教育本质属性。

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建设教育强国要坚持为党育人，以大政治观办大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的政治属性是指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而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这些重要论述鲜明地指出了教育的政治属性。

教育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建设教育强国要以人民为中心，以

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来考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教育具有鲜明的战略属性,建设教育强国要坚持为国育才,以大战略观来谋划,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这些重要论述鲜明地指出了教育的战略属性。教育要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深刻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舆情,正确处理小我与大我、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拼搏奋进,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 （三）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工作要求和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总体目标,强调建成教育强国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对建设教育强国进行了重新定位。新的定位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建成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将“建

设”改为“建成”，并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体性目标，同时强调建成教育强国在二者中的定位，即“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这就在历史动态发展中融合并深化了已有认识，既指明了建成教育强国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系，也明确了建成教育强国之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

首先，建成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这一新表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思维考虑建设教育强国这一系统工程，将近代以来中国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再到建设教育强国，最后到建成教育强国历史性地连接起来，强调了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意义，使建成教育强国具有了历史厚度和历史基础。这一美好愿望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是14亿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具有最广泛的民族共识和最强烈的民族情怀。

其次，建成教育强国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这一新定位强调了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地位，即建设教育强国不是达成某种目标的过程性概念，不单纯是具体意义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或工程，而是整体意义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也即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不是具体工程，它以立德树人工程为战略牵引，包含一系列要实施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等。

## 二、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教育问题，

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规律性认识，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六力”内涵新论断

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作出精辟论述：“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前进方向。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做出“六力”的明确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这一论断强调了教育强国应具备的六大能力，即教育强国的“六力论”，也是教育强国的六个基本特征。建设教育强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各项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好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一论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这一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不仅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而且更加全面系统深刻，明确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质。我们还应注意到，教育强国应具有强大的“六力”，服务于国家和民族2049年战略目标需要，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 1. 思政引领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教育

强国的思政引领力，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工作的能力。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的重大使命。教育强国的思政引领力彰显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之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铸魂育人，以强大的思政引领力确保人才培养方向，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

## 2. 人才竞争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人才竞争力。教育强国的人才竞争力，是指通过培养现代化人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能力。人才竞争力是世界教育强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才自主培养水平的突出标志。教育强国有多强，最后取决于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能力有多强。教育强国建设应该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促进支撑科技与经济持续、健康、绿色发展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供人才支撑，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 3. 科技支撑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力。教育强国的科技支撑力，是指通过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科技与经济实力的能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出路在创新，关键靠科技，归

根结底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唯有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才能为建设科技强国涵养源头活水，助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

#### 4. 民生保障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民生保障力。教育强国的民生保障力，是指以优质教育创造美好生活，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能力。教育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生保障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有力地阐释了人口大国如何办教育的重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是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国家发展的强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让人民享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化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

#### 5. 社会协同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社会协同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社会协同力，是指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能力。教育兴则国力兴、经济兴、文化兴，充分释放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以教育落实、保障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以教育强国助推经济强国、文化强国、民族复兴。同时，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主体协同互助的系统工程，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教育与社会相得益彰的良好生态。

#### 6. 国际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教育

强国的国际影响力，是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贡献中国力量，在全球舞台上展现教育影响力，彰显我国在世界教育发展潮流中的大国责任与担当的能力。中国教育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教育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教育强国建设要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发展，谋划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把我国教育发展置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之中，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效地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世界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教育强国的六大能力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割裂，全面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具体要求，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明确了方向。其中，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教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思政引领力，始终坚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的人民属性要求教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人才竞争力和民生保障力，培养造就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教育的战略属性要求教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力、社会协同力和国际影响力，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引领国家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 （二）建设教育强国要处理的“五大关系”新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

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五个重大关系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期领导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深刻认识，是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所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内外部基本关系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把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建设教育强国的“五大关系论”。

### 1. 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

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两个核心价值追求，支撑国家战略讲明的是教育强国建设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作用，满足民生需求讲明的是教育强国建设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价值。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断破解人民群众各类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也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也即是说，教育强国建设在支撑国家战略的同时，不能忽视民生需求，而是要不断满足民生需求，在满足民生需求的过程中支撑国家战略的实施。

### 2. 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这是对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指明了方向。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的关系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教育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知识学习是学生最主要的活动，是保存和传播人类生存与发展经验的基本手段，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基本途径；全面发展是学生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个体生命成长

的内在要求，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表述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把握好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在增长学生知识见识和能力上下功夫，让学生不断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和能力，同时也要注意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学生具备开阔的视野、扎实的本领、综合的能力。正因如此，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关系，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有效的知识学习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实现了知识学习的功能价值。

### 3. 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

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体现了教育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成长的过程，对教育强国建设提出了双重要求。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培养人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本体要求。满足社会需要是衡量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是教育强国建设中人才培养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派生。要建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学科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以社会需要倒逼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不断提升教育供给与社会需要的适配性。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卡脖子”问题，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构建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完善的教育结构和体系。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兼顾培养人才与满足社会需要，实现二者的统一。

### 4. 正确处理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

教育强国建设在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之间，既要求规范有序，又要求激发活力。应当看到，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是一对矛盾，规范有序是基本前提，激发活力是应然追求，规范有序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教，规范办学行为，严守教育安全底线；激发活力要求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创新教育理念思维,激发各级各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激发教育系统活力,进而激发人们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澎湃活力。这就要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5. 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

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扎根中国大地是指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强国,必须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从中国的国情和教育实际出发,坚持把教育改革发展创新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探索教育强国建设之路,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信心与底气。借鉴国际经验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是发现、吸收、借鉴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经验,以推动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中国成为教育强国是在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中体现出自身个性的过程。处理好这一重大关系,要求我们把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和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认真吸收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通过交流互鉴增强我国教育的综合实力,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五大关系”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规律。只有全面把握“五大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科学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才能确保教育强国建设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使教育真正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

### （三）建设教育强国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新论断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一论断肯定了建设教育强国取得的重要成就，总结了“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的发展经验，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指导性，深刻阐释了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我们答好“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何为”时代命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近30年来，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不断丰富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要义。“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加速实现国家繁荣昌盛。教育现代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从早期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教育现代化在艰难中前进。新中国成立后，从初期的“教育革命”，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确定，教育在国家现代化事业中的作用愈发显著。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通过全面谋划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实现了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由此可见，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作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不断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推动中国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才使建成教育强国具有了坚实基础。

在此意义上，建设教育强国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之间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此外，新论断从战略高度理顺了教育强国建设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是我们党作出的重大决策，而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揭示了二者之间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这就是说，建成教育强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教兴国和教育现代化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发展性过程，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支撑。这就需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担当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任，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上持续发力，坚定不移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

### 三、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新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为今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明确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统一部署了五方面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这五方面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内涵丰富、方向明晰，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和实践指导力，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明确了重点、提供了遵循。

#### （一）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并对其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基本路径、工作任务等做了明确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各种场合强调立德树人的重要性。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时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并阐明了立德树人对人才培养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这一要求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形成了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内在机制的新认识，为新时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高建设教育强国的思政引领力和人才竞争力提供了行动指南。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加强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逐步明晰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位置。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也就意味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要求，更是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抓手。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这就意味着在建设教育强国的系统工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是那个牛鼻子，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这类“复杂的系统工程”时善于运用科学思想方法来抓住主要矛盾，从而带动其他次要矛盾的处理和解决，这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思考复杂问题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工程。一是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加强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坚持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教材建设为抓手，以落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不断完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铸魂育人机制。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力推进“三信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同时，要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推动红色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推进育人方式变革，探索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新方式。三是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要将思政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纳入教育工作总体布局中去，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面，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大教育观办大教育，以办大教育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瞻远瞩。

## **（二）再次强调统筹实施三大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

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方面，这次全国教育大会再次强调统

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三大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并对这项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凡成就与伟大变革证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教育在三者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科技进步依靠人才，人才培养依赖教育。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样必须前后联系着学、贯通着学，方能理解总书记作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深意。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就曾表示，“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由此可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的思想在党的二十大之前就已萌生。

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科技、人才问题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党的十九大和更早的党代会报告中，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放在不同部分论述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并且单独列章阐述，具有深远影响。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强调以三大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是再次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现了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的延续和深化，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二是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工作所在的位置看，本部分内容在五大战略部署的第二顺位，紧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个牛鼻子，在教育强国建设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突出。就具体部署而言，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还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做出明确的工作部署。

首先，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是牵引，人才培养是基础，教育工作是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着眼处是创新，即通过教育创新培养适应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从而提升国家总体创新能力，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同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关键在于，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人才、空间结构。

其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成果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产物，是智力资源的结晶，唯有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能够运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并畅通技术转化机制，才能推动现实生产力的提升。为了释放出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持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力量，必须加强校企科研合作，探索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再次，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培养

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必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教育强国一定是职业教育强国，要以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坚实支撑。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人才力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重视职业教育，探索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设职业教育强国。

### **（三）首次提出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在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方面，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提出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并对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落到实处，落到人民心坎，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化了对于教育公共服务和教育公平的规律性认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实现教育优质公平的价值要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把更好的教育列为人民的期盼之一；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让每个人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将人民中心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专门部署，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为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价值方向和行动指南。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教育发展活力，“要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足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为此，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构建好有利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提出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进一步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具体内涵，是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惠、可及、便捷的前提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育投入的合理分配，使人民共同享有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双减”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所作出的战略部署，要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这是首次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表述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强调了教育数字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可及性和便捷性的优势，体现了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要求。

#### **（四）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并对行动实施作出全面安排**

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方面，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并对这项行动的实施作出全面安排。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强师必须尊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早在2013年教师节前夕致信广大教师时便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调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中华传统师道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也体现在中国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是新时代教育队伍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首先，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将教师队伍建设的论述放在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之前，充分体现了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关怀和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此项行动，是教育家精神落地落实入心的重要举措。因此，要探索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的推进路径，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终身学习、管理评价体系，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其次，从“教育家精神”到“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复杂问题时的全局思维、战略思维和系统

思维，既高屋建瓴地为事业发展提供战略引领，又直击问题本质为事业发展谋划行动指南。再次，尊师重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这些部署体现了对教师的充分尊重和高度重视，强调了对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的维护，有助于加强教育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激发教师内生动力。

### **（五）首次明确提出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在教育对外开放方面，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首次明确提出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并首次强调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体现了对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为衡量标准，强调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推动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则进一步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这就要求既要做好“引进来”这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又要做好“走出去”这篇大文章，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升中国教育软实力，为世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教育强国一定是世界意义上的教育强国，是走向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强国。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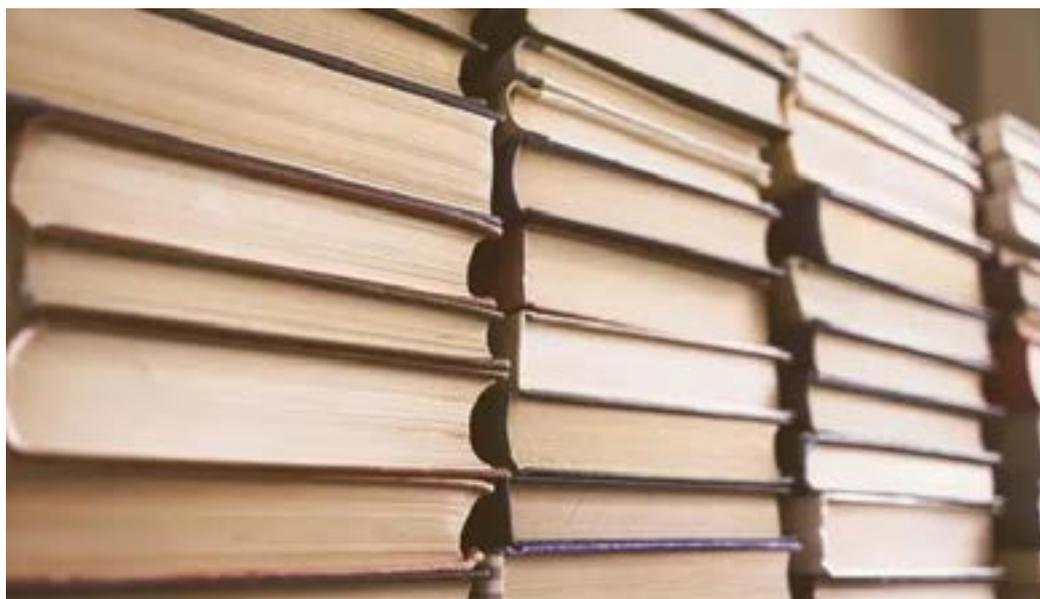
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际上是落实教育强国“六力”中“国际影响力”战略部署，是推进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战略举措。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这一要求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谋划了前进方向，进一步凸显了“走出去”的重要性，要推动构建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宽领域、更加主动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新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加强中国教育理念与思想的海外传播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政策标准制定，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教育道路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统一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崭新篇章。

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教育强国的规律性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教育强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对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重大关系、战略任务和重大部署进行系统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

育强国”等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新时代全面建成教育强国的指导思想。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探索教育事业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做好教育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稳步推进，而且为世界教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新时代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在全面领会、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奋力夺取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胜利。



杨宗凯

## 以数字化夯实教育强国基点

来源 | 《中国教育学刊》2024 年 02 期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杨宗凯

教育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是对数字时代创新人才需求的战略应答，也是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我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深刻影响，将其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教学创新的战略重点，积极推动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取得一系列显著进展。

一是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整合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2022 年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共连接各省区市 52.9 万所学校，面向 1844 万名教师、2.91 亿个学生和广大社会学习者，汇聚中小学资源 4.4 万条，建立起公共资源服务体系，有效保障了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平台的建设应用推动了“双减”工作的深入实施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截止 2022 年 3

月1日，平台日均浏览量比“双减”前增加了24倍，陕西、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借助平台资源实施“双师课堂”，全面推行国家课程，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二是依托教育数字化示范区先行引领，打造数字化时代教育教学新模式。教育部实施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试点、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区等一批试点示范，累积了可借鉴的先进经验和优秀范例，实现了学校网络设施全覆盖、师生数字素养显著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明显增加。其中，宁夏建立全国首个“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0%，基础教育一流课程入选率位居全国前三位，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研究团队测评，全区教师数字素养优秀率持续三年提升；湖南长沙示范区通过重点实施八项工程推动智慧教育建设，搭建了“终身教育学习大平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设计实施“知情共育”教学方案，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此外，各级政府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浙江温州等地持续挖掘教育大数据价值，建立了融合数据规范、师生画像和服务保障的教育大数据体系。

三是开展数字化赋能教育基础研究，探索教育教学数字化科学发展规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教育部大力推动下，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代码F0701）自然科学基金序列正式启动，同时，科技部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前沿科技研发体系，一批教育数字化高水平研究成果持续涌现。2023年4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赋能教与学的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正式立项，该项目旨在研究人机协同教学环境下的学习认知机理和教学适应性策略两大科学问题，一方面注重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两个场景、东中西部互助联通的百万师生示范应用；另一方面着重实现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教师和学生的减负增效。以数字化夯实教育强国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具体路径可从以下三方面考量。

其一，培养德育为先、知识为基、能力为重的大批创新人才。强化思政教育，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善用数字技术聚合教学素材和资源，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加强数字人文、STEAM教育等课程建设，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和综

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以综合知识应用为导向，建设交叉学科，发展智能教育学，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善用数字手段和平台，让学生通过探究解决实践活动中的“真问题”，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

**其二，推进 AI 赋能、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数字教学环境下的人机协同，促进了物理空间、资源空间和社区空间的无缝衔接，人类认知和人工认知得以交叉融合，实现多元化、智能化、综合化的教学体系构建，泛在化、个性化、协作化的学习场景塑造，推动教学模式从“师—生”二元结构转变为“师—机—生”三元结构。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智能技术，将提供更具交互性的学习体验，助推实现“师师有助教、生生有学伴”愿景，拓宽教育可及性，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支撑学生的个性化、终身化学习。

**其三，构建全纳、公平、开放、可持续的教育体系。**以基础教育为基点，充分发挥我国教育体系优势，集成运用数字技术，建立互联互通、即时高效、动态共享的数字管理保障机制，以教育数字化助推教育管理高效化；搭建以学习者为导向、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形式灵活适切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推进“三个课堂”应用实施，弥合数字鸿沟、智能鸿沟，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国际数字交流与合作，构筑国际沟通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育国际化，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袁振国

## 重塑未来

——教育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突破性意义

来源 | 《教育研究》2024 年 12 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教育部文科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 袁振国

未来未来，何以重塑？这里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未来不是过去的重复，也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而是我们对未来挑战和机遇的判断，是胜任未来的提前部署。它是对现有教育的改造，更是对未来教育的想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目标。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数字化之所以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是因为数字技术的革命实现了从纸质化到数字化的跃升，携带着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新质生产力，为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提供了条件。

第二，三千年前学校诞生，开始了人类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文明传承；三百年前现代教育制度诞生，开始了人类大规模标准化的教育；今天数字教育诞生，开启了人类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的序幕。面对人类新的历史大变革，必须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充分发挥数字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的突破性作用，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未来教育的重塑寄托着我们的期望和梦想。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制度变革的速度，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明显滞后甚至阻碍着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对未来教育的构想和建设，必须克服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打造教育新形态。

## 一、教育数字化的技术基础

教育数字化是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在教育全过程的运用，从而引发教育活动的创新、重构，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将数字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运用，而且是在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数字的“资产”，通过数字资产强化数字教育的竞争力，为未来教育不断创造价值。

### （一）数据驱动

数据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是将信息转换为数字格式，通过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度量的数字数据，并建立数字化模型，最终转化为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以往人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感知世界，通过大脑记忆世界，通过纸笔记录世界，容量、速度和恒常性都大大受限，而数字化是通过计算机对格式化了的信息数字进行存储、识别、传输和处理，它记录了世界上的一切信息，实现了信息容量、速度、恒常性的无限突破，以及声音、语言、图像的自由互换。

数据资源的价值不仅在于数据本身，而且在于数据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转化为数据资产，转化为价值。数据和数据复杂交互形成的数据关系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这就为真实与虚拟两个世界交融、数据与思想双向驱动奠定了基础，

引发新的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和创新组织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发展起来后，算法成为激活虚拟宇宙的利器。算法在本质上是建立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度学习发现数据间存在的各种关联。但凡可以表示为序列的数据，无论是语音、文字、图像，抑或蛋白质序列，都可以使用转换器（Transformer）捕捉上下文关系，赋予我们通过数据洞察和理解世界的能力。

## （二）互联互通

链接是数字化的关键。基于网络的数据链接，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无缝连接。链接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更重要的是信息和数据的连接。互联网是链接的技术基础。互联网从有线到无线、从固定到移动、从单节互联到万物互联，链接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形式越来越多样，覆盖面越来越广泛，操作上越来越便捷，为教育和学习的时时、处处发生奠定了基础。慕课大规模线上教学，可汗先学后教的“翻转课堂”，最近人工智能的无人课堂，都还只是万物互联背景下教学变革的初试牛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大语言模型的横空出世，赋予了互联网以新的意义，为教育教学的深度变革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千百年来教学模式是教师讲学生听，以获得标准答案为目的和成功的标志。这种教学模式的文化基础有两点。第一，教师是知之较多者，是经验和真理的拥有者；第二，世界变化和知识增长缓慢，一朝受教，终身有用。互联网和大语言模型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基础，教学的目的和成功的标志不再是获得答案，而是提出问题；不再是教师讲学生听，而是师生互相学习，人与机器协同发展。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教师失去了拥有知识优势的同时，让所有人时刻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大语言模型在使答案变得唾手可得的的同时，也使得提出问题的能力比获得答案的能力更重要，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的判断比获得知识本身更重要。

## （三）海量资源

汇聚资源是数字化的最大优势。网络拥有一切。万物互联使世界上一切显性和隐性的信息都随时可以被每个人随意获取，传统教育将知识设计为课程，编辑为教材，组织成教学，使得丰富的知识一次次被窄化，一次次被压缩，而互联网就像是掀开了天穹的被子，一切知识都汇聚于每个人的眼前。每个人都可以畅游

在知识的海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海量知识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其呈现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学习资源的获得更有效、更有趣、更个性。一是颗粒细小，即学习单元的容量小和学习需要的时间短。二是形象生动。数字资源通过多媒体、多模态技术，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生动形象的学习资源融为一体，使得学习内容的趣味性大大增强。三是自主选择。学习者不仅可以从汗牛充栋的信息海洋中提取、选择自己需要和喜欢的内容，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任意增删、修改，个性化处理。四是自适应推荐。通过知识图谱、学生画像，借助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预判学生学习情况，服务于个性化学习。

#### （四）高速便捷

无延时是数字化发展的根本保证。互联网从 2G 到 3G，再到 4G、5G，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功能越来越强大，传输速度以几何级数递增，实现了无延时传输。无延时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是，由于信息传输速度造成的时间差消失了，所有人都同时站在新的信息的起跑点上，所有人都可以同时打开新世界的画卷。一切由于信息传输时差造成的不公平都可能消失，一切凭借优先获得信息的优势也都消失了。依靠信息优势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教学形式都不再适用。凭借教师参考书维持的教学模式已经完全不可持续。教师和学生面对同样的新知识、新任务、新挑战，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提供了可能。

#### （五）人机共创共生

人机相互激发思想是数字化、智能化最大的爆点。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后，由于它具有自主学习、自主调节的功能，不仅能够学习文本的形式，也能够学习和理解文本的内容，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学习能力、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成了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可以与人进行对话的主体。以往教育过程中只有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的全部内容，而现在新增加进一个主体——机器，教师、学生、机器形成了三元主体关系，形成了师生关系、师机关系、生机关系，以及正在出现的机机关系，人不仅从机器那里获得信息和思想，而且在与机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相互启发，激发出新的思想和创意。毫无疑问，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机器的理解、推理和对话能力会越来越强，人与机器共同创造、共同生存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

## 二、教育数字化的价值目标

技术没有价值，教育具有价值。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向四面八方飞奔；而教育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和梦想，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努力。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而且是情感的陶冶和信念的养成。数字技术可以替代大量重复的、繁重的工作，极大地提高教育的效率；数字技术的智能化也可以使其“具有”人的思想和感情，但那是人“喂”出来的，用什么语料、算法使其具有什么思想和情感，是人的力量。人工智能具有自学习功能，但它学习的还是人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数字教育绝不是数字技术在教育上的简单运用，而是我们的教育观、价值观与数字技术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我们立足教育理想发展数字教育的目标。

2019年5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伴随每个人的一生”（终身化）、“平等面向每个人”（公平性）、“适合每个人”（个性化）、“更加开放灵活”（自主性），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数字教育的价值目标，回答了教育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的价值引领意义。

### （一）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终身教育是未来社会的基本需要，也是人生的最大福利。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是私属品和专属品。所谓私属品，是说教育不是国家行为，而是私人行为。工业革命之前，教育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功利意义，能够接受教育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非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工业革命以后，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和个人就业的基本需要，教育才从私属品逐渐转化为公共品，才有了义务教育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蒸汽机到人工智能，普及教育水平也从小学到了大学，从小众到了大众。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专属性的，是为未成年人提供的教育。同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终身教育成为当下更是未来的需要。一是人均寿命延长。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比

2012年提高了3岁以上。2024年7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报告，提出全球人均预期寿命2024年达到73.3岁，比1995年提高8.4岁，并预测到2054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可能达到77.4岁。二是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202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2.97亿，占总人口比重的21.1%。很多国家比这一比例更高，世界人口“变老”已成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传统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人数，将会被不在学校里学习的人数超越。现在提到学校和学习，涉及的对象还停留在6-22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但是，随着不在学校里学习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可能到2035年左右，不在学校里学习的学习者将会成为最大的主体。老有所学已成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必然要求。

传统教育制度建立在学校教育体系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实施终身教育既缺乏制度环境也缺乏技术支撑。现在，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终身教育的可能，数字化的发展，为学习、学分、学籍管理突破时空限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打通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鸿沟创造了条件，终身教育将成为社会的崇尚、每个人一生的福利和责任。

## （二）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收入不公影响人一时，教育不公影响人一生。教育的私属性决定了教育的贵族性。教育成为公共品之前，是少数有钱有身份的人的消费品。17世纪以后，早发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教育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义务教育的年限逐步提高，从三年提高到四年、五年……十二年、十三年。每个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接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可谓水涨船高。但是，这并不一定说明教育是公平的，而且在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地区之间、人群之间、学校之间、个体之间的教育差距仍有拉大的可能。其原因在于机会有限、资源有限，导致了不同的人获取教育资源的先后上、质量上存在差距，并成为一种代际传递。数字化、智能化为弥合这种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数字化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快速、无限传播，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在同一个时间里分享优质资源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分享是低成本的，数字传播的无延时降低了时间成本，网络普及降低了经济成本，储存、回放、选

播功能降低了机会成本。虚拟数字技术通过模拟仿真为硬件设施不足的地方和学校解决了实物观察和动手实验不足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硬件不足的问题；而且，虚拟仿真实验还解决了实验材料消耗负担重，以及具有不同程度危险性和观察困难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实验效果。

当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必然会缩小差距，这种差距还可能变大，出现所谓的“数字鸿沟”、“信息孤岛”。这就需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先进的理念和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做好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倾斜后进，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为弥合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三）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个性化是社会丰富多彩的深厚根源，也是个体价值的根本体现。以年龄划分和班级授课制为基础，以招生、考试、升学为管理模式的现代教育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效率，使得普及教育得以实现。但是，现代教育假设相同年龄的儿童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是相同的，这就导致了现代教育的致命弱点：标准化——标准的答案、统一的管理方法、被窄化的内容，这极大地限制了人的个性化和自由性发展。不同的人经过教育的通道变成了相同的人，人们对此既不情愿但又无奈。尽管世界各国不断尝试通过选修制、学分制、弹性授课制、走班制等多种方式缓解和抵消班级授课制带来的标准化弊端，但总的说来只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教育数字化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教育大变革创造了条件。数字化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数字化教育为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数字教育之所以能够实现教育的个性化，是因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大语言模型的自适应学习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广阔的道路。它通过构建揭示学科知识内在联系的知识图谱，测量和诊断学习者的已有水平，跟踪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收集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数据，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推送合适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路径，在反复测量、推送、学习、反馈的过程中，把握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为每个人提供最适合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节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满足学习者的成就感，建立学习者的自信心，使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这一个”。

#### （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开放灵活是创新的土壤，也是人生幸福的保障。有开放才有比较和选择，才有竞争和流动；有开放才有多样，才能满园春色生机盎然。相反，自我封闭、画地为牢、定于一尊，必然单一、僵化、落后。是开放还是封闭，是灵活还是僵化，虽然与认识、利益、文化、制度等相关，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根本决定因素。农业时代，以家庭为单位局限于一隅，信息不通、资源有限、技术简单，垄断资源、以邻为壑是自我保存的法宝；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人员流动和信息流通加快，开发资源成为发展的重要动力，协作共享成为发展的共同需求；信息化，特别是数字化到来之后，信息传播无论是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飞跃，信息交互成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昔日垄断信息和资源的科层制度、垂直管理模式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数字化既提出了开放灵活的要求，也提供了开放灵活的条件。现在一个人从书本、课程、学校获得的信息比例越来越低，通过组织、计划、指定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未来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形成开放灵活的体制和机制，视野才能更加宽广，选择才能更加多样，事业才能更加兴旺。

### 三、教育数字化的未来形态

数字教育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大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通过数字技术对教育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赋能，开辟教育发展的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的新优势，最终实现对教育的重塑，形成人类教育的新形态。

#### （一）突破时空限制，时时、处处、人人可学

说到教育，人们头脑中很快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座座围墙学校、一幢幢独立教室、一排排课桌板凳，固定的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学习固定的内容。教育活动被限制在特定的时空里。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被彻底突破，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他认为合适的节奏和方法学习任何内容，学习行为“泛在化”。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巨大工程，

就是依托数字化的成果实现的。从固定教育到泛在学习,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是整个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因为固定,有了根据年龄的分阶段进行招生、考试、分班、升级的学校教育制度;因为固定,有了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因为固定,有了相应的服务于选拔的评价制度和管理办法;因为固定,有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而泛在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学生成为学习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教育体系向学习体系转变是未来教育形态的最大特征。

## （二）突破中心概念，学习者高度自主自治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起来以后,“去中心化”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的概念相对,指的是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之间可以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会通过网络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被称为“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是一个演变过程,不是不要中心,而是节点可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也就是说,在中心化的系统中,中心决定节点,节点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中心就无法独立生存。而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中,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而且,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强制性。“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本质是学生的自主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自主发展,前提条件是学生有自主选择权,有自主选择的内容和通道。去中心化系统就提供了这样的内容和通道。

在网络运用的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可以提交内容,网民共同进行内容协同创作。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1.0)时代,今天的网络(Web2.0)内容已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的,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等级平等地共同创造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升级版中,每个学习者都是中心,都是链接人和被链接的关节点;每个人既是学习者又是教育者;每个人随时随地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成为他人

的资源或噪音，都既是内容的获得者又是内容的提供者；每个人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留下痕迹成为信息和数据，成为智能化更加智能的力量来源。

目前，去中心化网络模型在区块链技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些平台通过去中心化方式提高了社区发展速度，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未来教育形态的治理，如何推动协作式监管、构建新型法治规则，如何精细化管理用户身份、建立责任认定机制、技术创新与法律规制协同保障数据安全，等等，都将是面临的新话题、新任务。

### （三）突破交往限制，网络社区发达

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学习者的选择空间非常有限，特别是交往对象受到极大限制。一个人只能进入一所学校、被编入一个班级，和几位教师和班级同学发生交往。他的整个学习生涯认识的人、交往的对象非常有限。如果遇到好老师那是一生的幸运，如果遇到糟糕的老师则是一生的悲哀。任何一位老师也只能教授有限的学生，即使他的水平再高、教学艺术再优秀，受益者也非常有限。而在数字化教育的环境中，从理论上说，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选择任何一位老师，老师可以教世界上任何一位学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成为现实。同时，任何人可以进入任何网络交往空间，建立交往社区，无限拓展交往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与自己喜欢和适合的人交往，学生、教师都需要重新定义，师生关系也在互动互换的场景中呈现出异样的光彩。

### （四）突破实体世界，虚实世界融合

数字化缔造了一个与真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数字孪生。一是这个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将真实世界的一切在虚拟世界里呈现；二是这个世界是对非真实世界的想象，虚构出一个真实生活中没有的世界；三是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互动、真实人与虚拟人互动，产生新的信息。现在，虚拟世界无处不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真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随身携带货币和证件，但不能不随身携带手机，信息通讯、商品交易、票务买卖、金融活动、交通运行、城市管理，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终端进行控制。教与学的活动，信息发布、家

校沟通、作业传输、师生对话等都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虚实结合。两个世界的并行与交互，使得教育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数量与速度都发生着深刻变化。

在实体学校，一个人只能进入一所学校，在一个班级里学习，与有限的老师和同学交往，有9年甚至12年都被锁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交往圈里，“好生”、“差生”被贴上了固定标签，形成了固定身份的小社会。然而，在数字教育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结交各种各样的网上朋友，都有很多的虚拟朋友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些朋友圈具有不同的话题、不同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要，在不同的朋友圈里“自由窜苏”，以寻求别人帮助和帮助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千万友”，一键搞定。

#### 四、教育数字化的本质要求

教育数字化与其他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有着根本的不同，教育以外的各个行业的数字化是物与物的联系，不需要甚至排除人的参与，人在“其外”，而教育是人与人的联系，离开了人教育就不存在了，人在“其中”。教育数字化通过人，依靠人，为了人，以是否促进了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为衡量标准。

##### （一）教育数字化的关键在人机协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类的发展与工具的发明相辅相成。人从使用石头作为工具，到使用铁器，再到发明蒸汽机、电动机，直到使用电脑、网络，人的五官更加灵敏，人的手臂不断延伸，人的大脑更加强大。没有机器，人只是赤手空拳的人；机器没有人去运用，也只是一堆金属材料。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到来，大大拓展了人的学习时间和空间，不断提高着人的学习能力。机器已经成为人本质的一部分，人和机器已经融为一体。教育数字化离不开技术，也离不开人，人机协同才能把人和机器的功能都发挥出来。人机协同水平越高，人和机器的功能就能够发挥得越好。硬件环境、系统平台、应用软件再好，没有善于运用的人，产品和技术的作也难以全部发挥出来。数字技术越发达，对人运用

机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人的能力越高，机器的作用发挥得就越好。两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

人机协同不仅是人和机器协同，而且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机器、教育环境的多元交互。人机协同的能力不仅是智能化产品的具体运用，而且是教育者结合不同的教育环境，以学生为中心对不同工具的选择、运用、优化，并在交互中实现专业能力与机器能力的双重提升。

## （二）人机协同的三个阶段

1994年网络元年特别是2016年人工元年以来，人机协同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回顾几十年来数字化发展的历史，人机协同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电子化阶段的人机互动、网络化阶段的人机融合、智能化阶段的人机共创。

电子化阶段的特征是人机互动，机器在教学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虽然数字技术在教、学、管、评的各个环节已经有了广泛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收集相关教学数据，进行离线建模，对教、学、评、管各个环节进行赋能，但是各项教学活动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也可以说，没有数字技术、数字产品的介入，一切教学活动照常进行。

网络化阶段的特征是人机融合，在这个阶段，机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与机器在教、学、管、评等各环节互动加深，缺一不可。人机融合深刻改变着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模式，改变着学生学和教师教的活动方式。教师可以在实体和虚拟两个空间组织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虚拟技术参与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突破了实体空间的限制。

智能化阶段的特征是人和机器共同创造知识。“机”不再限于计算机，而是包含计算机在内的智能感知、增强现实、区块链、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智能技术。这个阶段并不是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一种深度的共创关系，使得机器成为人类智能的拓展和延伸，人的智慧也会被机器不断学习，机器的智能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判别式人工智能的精准决策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

个性化学习内容创造，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面教育生态重构，教育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

###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教师是关键

加强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培养，促进其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是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抓手。数字素养既包括运用数字产品和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教、学、管、评的能力，更包括评估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活动的成败得失的能力，包括将现代数字技术的运用与传统优秀教育经验融会贯通的能力。在我们的一项关于江浙沪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大规模调研中，教师们反映，在面临数字技术资源使用、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时，缺乏信心和动力；对数字化、智能化新兴技术的知识与使用技能，缺少足够的了解和能力储备；将数字化应用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能力有待提高。教师们还反映，当前数字化集中在“台前”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上，但对于课堂教学“幕后”的数据分析与应用以及人机协同育人的关注度不足、参与度不高，与传统优秀教学经验融会贯通不足，甚至削足适履，传统优秀教学经验有被淡化倾向。所以，教育数字化并不是盲目地攀新求高，更不是被技术牵着走，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才是重中之重。要把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教师数字化学习与研修纳入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开展培训课程开发和教师数字画像的探索，采取全员参与、分层发展、校际合作的模式，推动区域、学段、集团、学区多层次研修模式重构和流程再造，鼓励通过组织竞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在人机协同的实战中持续推进教师数字技术与学科的融合应用。人机协同不仅是基础教育教师的个体使用，它也是一个触及方方面面的系统，要调动高校、教研、培训等多方面的积极性，整合优质资源，加强数字化应用骨干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团队建设，打造区校联动、共建共享的学习型共同体。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的逐步发展、逐步提升，包括硬件基础、技术环境、系统平台、资源积累特别是人的素质的提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不断探索跃升的过程。所谓探索，就意味着未来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过程，数字化没有既定的目标等着我们，也不是放弃我们既有

的基础重起炉灶。数字化教育要因时因地因势而为，在不同阶段确立不同的重点，攻克难点，向我们期望的目标前进。教育数字化方兴未艾。要充分发挥教育数字化之于教育强国的突破性意义，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视野，瞄准数字技术的前沿领域，借鉴世界数字教育发展的新成就、新技术、新方法，为我所用；与此同时，我们的数字教育建设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技术没有价值，但数字教育必须坚持中国教育的立场和方法，在算法、语料、模型等重要的节点和关键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数字伦理、数字责任、数字安全上，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式教育数字化发展道路。



孙杰远

## 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

来源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1月首发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孙杰远

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数字化正对世界教育变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教育数字化成为新时代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的关键途径，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属性的重要支撑。世界教育强国无不是教育科技领先的大国，我国要建成教育强国，只有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走在教育数字化前沿，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新方向，方能形成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跃升的新优势，因此，教育数字化无疑也是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支撑。教育数字化不仅体现为数字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更是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的系统性创新。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教育数字化不仅为实现教育信息化提供了重要途径，更是推动教育变革、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 一、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的核心价值

建成教育强国，落脚点是人民福祉。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根本意义在于支持和满足新时代人民有能力且自主地过上一种数字化生活，同时培育数字时代新人的科技创新精神和数字创造力。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于教育数字化所伴生的价值创造性，主要体现为教育数字化契合新时代社会需求、促进文化创生并带来人类又一次认知革命。如此，教育数字化必然成为新时代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巨大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教育数字化转型，就很难在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浪潮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

### （一）生存契合：教育数字化根本上源自数字时代人的需求

教育数字化转型契合现代人的生存生活需求，也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当前社会加速变革发展，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传统教育模式已逐渐不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实践与发展已迥异于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社会基础、技术环境和生产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人只有持续学习新知识、技能和态度，才能应对各种挑战和变化，过上数字时代新生活。教育数字化恰好满足了人在数字时代对“高质量学习”的追求。它突破了时空限制，通过个性化学习、随时随地学习、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及终身学习支持等方式，为每个人提供更加灵活和丰富的学习机会。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教育资源在学习端的普遍覆盖，将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缩小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人群之间的教育差距，成为国家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推广普及应用，正在逐步解决教学软资源总量不足、流动不畅、成本高昂等难题，为实现高水平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性，也将进一步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教育数字化为支撑，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

### （二）文化创生：虚实情思无限交织、创造、传播、延展的文化形态

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义，在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文化的创生和发展呈现出虚实情思无限交织、创造、传播、延展的文化新样态。

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时空界限和意义固化，为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人的文化需求提供了无限可能。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社会产物，又是社会生产媒介，“它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它们的（相对的）秩序以及/或者（相对的）无序”。教育数字化构建了一个新型“数字空间”，这一空间既是文化传播和创新的产物，又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这一数字空间中，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实现有机融合，催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和表达方式。教育数字化通过构建这一虚实结合的文化空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利用元宇宙技术重现历史场景，提供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运用大数据分析古典文献，揭示新的文化关联与规律；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形式等。这些均为教育数字化促进文化创新的具体实践。同时，教育数字化为跨文化交流和全球文化对话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数字空间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可以便捷地进行交流与互动，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不仅丰富了教育内容，也为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 **（三）认知革命：知识分类、存储、感知的重构与算力、算法、人机协同成为认知基础**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语言的产生到图像记录的出现，再到文字系统的发明，每一次信息传播方式革新都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突破和拓展。技术革新对人类认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重构了知识的分类、存储和感知方式。数字技术使得海量信息的存储和快速检索成为可能，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组织方式。其次，算力、算法与人机协同成为认知的新基础。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智能算法使得复杂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高效。再者，创造力和认知速度得到极大提升。人工智能辅助创作、自动化分析等技术大大加快了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速度。1976年，美国数学家用计算机辅助证明“四色猜想”的案例，是人类利用技术推动整体认知发展的典型代表。这一突破不仅解决了一个困扰数学界百年的难题，更展示了技术在复杂问题求解中的巨大潜力。随着技术的迭代发展，其角色已从单纯的人类肢体延伸，逐步向具有“人格”的交互伙伴转变。传统教育资源多为静态形式，学习者主要通过观摩和参悟来获取知识。数字化技术的融入突破了时空限制，提升了

教育资源的视听质感，但往往交互性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创造动态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能，“苏格拉底式”的新型认知学习方式正在革新传统的“参禅悟道式”学习模式。然而，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技术的批判：过度依赖电视等媒体可能导致严肃公共话语的衰落，弱化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必须坚守不变的精神核心。这个不变的精神核心包括人文关怀、道德伦理和文化遗产。

## 二、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的逻辑理路

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强国建设的三大基石。教育数字化作为一种新兴变革力量，正在重构它们的固有生态。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应用重构着传统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为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创新路径。就科技而言，教育数字化既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又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加速器，促进了教育与科技的深度整合。人才培养方面，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个性化发展轨迹，有利于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才。

### （一）教育全要素重组与未来学校：教育数字化衍生教育变革

教育数字化带来的是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亦即教育要素的重组和再结构化，进而构建全新的未来学校样态。教育教学实践层面，教育数字化革新了传统教学的教、学、管、测、评各环节的工具与技术，教学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智能交互式电子白板、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直观；智能学习平台和移动学习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学习路径，使学习更加自主、便捷、高效。教育管理信息系统（EMIS）的应用提高了教育管理效率；自适应测试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教学评估的精准度。本质上，教育数字化是一个以数字技术驱动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互联网+教育”模式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泛在学习逐渐成为现实。例如，浙江省的“教育大脑”建设项目展示了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决策中的应用，推动了教育治理的科学化和精准化。广西的“八桂教学通”利用

云计算技术提供便捷的教学访问，提供数字作业和云课中心等功能，提高了教师教学质量，同时培养了学生数字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

教育数字化带来的深层次教育变革是教学主体教、学形态的巨大变化。显著表现在：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新型教学模式对师生角色的重新定义。这种模式之下，学生通过预先观看教学视频等方式自主学习新知识，课堂时间则用于师生互动、协作学习和问题解决。该模式融合了视频制作、在线学习平台、实时反馈系统等多种技术要素。教师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促进者，学生则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究者。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效率，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教育数字化是教育全要素变革的过程，随着观念愈发清晰和行动愈发深入广泛，逐步催生出未来学校概念。未来学校即一种融合物理和虚拟空间的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该环境基于“介导沉浸”理念，具备多媒介及虚拟环境流畅性、群体学习、学习平衡、非线性表达和个性化学习体验等特征。未来学校作为一个整合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学习环境和创新教学模式的教育生态系统，目标是通过个性化学习和高阶思维培养，发展学生适应未来创新型社会所需的能力和素养。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数字校园和智慧教室建设，大力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学习者数字意识，为未来学校的构建推广奠定基础。未来学校被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是教育 4.0 时代的核心任务。美国费城学区与微软公司合作的“未来学校”项目，是该概念最早的落地实体，探索了如何利用先进技术创造适应 21 世纪需求的学习环境。在我国，2017 年教育部启动“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计划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确定的核心任务，通过学校结构性变革，使空间、课程与技术的融合，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体系，为每一个学生提供私人订制的教育。中小学校长们期待的“未来学校”，则主要聚焦四个方面：构建融合数字与文化的智慧环境；推进以思维创新为导向的智慧教学；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智慧学习；建立家校社协同的智慧管理。这些路径旨在平衡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通过温和的数字化手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未来学校既是在教育 4.0 发展阶段人们对未来育人方式的整体畅想，也是未来教育建设的系统化发展方向。

## （二）思维与方法的革命：教育数字化推动科技创新

教育数字化对科技创新的直接作用，直观体现为高等教育孵化新兴科技创新，

展现高等教育机构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的崭新角色。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力“硅谷”崛起。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学加速走出“象牙塔”，逐步构建起产学研一体化教育发展模式，核心目标就是推动科技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前沿，成效越来越显著。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大硅谷”为例，其汇聚顶尖人才，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成果转化；吸引投资和企业入驻，形成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区域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有望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助力科技强国目标实现。教育数字化突出强化了教育促进科技创新孵化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先进的虚拟实验室和仿真环境，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and 创新能力；数字化平台促进了跨机构、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加速了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创新创业教育的数字化升级和智慧化大学科技园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的直接贡献。教育数字化对科技创新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实现，作用力虽不能立竿见影，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教育数字化不仅传授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新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这种转变使得人才在进入各行各业后，能够以创新的视角推动科技发展。例如，通过数字化教学，学生更容易形成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思维，这对于解决复杂的科技问题至关重要。

教育数字化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催化剂，加速了知识传播和创新思维的形成；又是粘合剂，促进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间的融合与协作。作为催化剂，教育数字化通过数字化工具，使新知识和新思想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为粘合剂，它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为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创新提供了可能。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催生了创新变革合力，构建了人才培养的新型意识场域。数字技术的高速传播和广泛应用，将分散模糊的奋斗目标清晰化、具体化，使每个个体明确认知自身在新时代的角色定位和责任使命。这种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目标的一致性，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形成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通过数字化赋能，教育体系更能精准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从而有力推动我国科技实力的提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

### （三）过程重塑与质量优化：教育数字化改善人才培养

教育数字化不仅是教育技术与工具的变革，更是学习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

深刻转变。数字技术驱动下，学习不再是孤立行为，学习是与节点和资源建立连接并编码新知识的过程，强调交互，且注重创造新节点促进知识生长，以解释特定时代的学习问题并契合时代与知识特性。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在复杂网络中识别、连接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得到系统塑造，学习者通过建立广泛的知识网络和进行知识重组加工，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极大发展。

同时，教育数字化让“具身学习”更加生动有效。人的认知过程不仅发生在大脑中，还与身体的感知和动作密切相关。虚拟教育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学习者创造了沉浸式学习环境。学习者可以通过身体的交互和感知来进行实践和探索，增强学习的真实感和参与度。此外，虚拟技术创造出智能化虚拟导师，实现了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个性化对话教学。例如，新疆师范大学开发的“孔子”大语言模型会话机器人，通过扮演虚拟导师的角色根据学习者的反应实时调整教学策略，提出启发性问题，引导学习者深入思考和探索。这种交互式的学习方式不仅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还能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教育数字化为改善人才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教育数字化并非完美无缺。我们需要警惕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过度依赖，避免教育沦为工具思维控制的场域，防范技术僭越带来的教育本真意义式微的风险。马克思批评工业化导致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教育数字化也要防止学习者异化为“数字设备的附属品”。

### 三、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对

教育数字化是一个全世界都在积极探索发展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数字化是未来世界教育强国发展的核心竞争领域，因此，加速教育数字化几乎成为各国教育战略的关键行动。近年，中国教育数字化发展速度很快，但也面临不少挑战，需要在不断迎接挑战、解决问题中推进高质量教育数字化。

#### （一）警惕万能论：教育数字化的“效应假设”及其应对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要义，但并非教育现代化的全部。长期以来，

学界和教育实践领域，总存在一种基本假设或认识误区，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教育技术变革发展，就是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这不仅窄化了教育现代化外延，事实上也遮蔽了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本质内涵。教育数字化也不是解决现代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的“万能灵药”，尤其在培养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底蕴和共情能力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以国学学习为例。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精髓，对其学习，往往需要深入的文本阅读、师生间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对文化氛围的直接感受。这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难以通过纯粹的数字化方式完全复制或替代。例如，学习国学需要在文学典籍的阅读过程中进行深度学习和思考，以实现与前人的知识和情感的交融。然而，数字化环境中过度呈现的图像和音频可能会削弱这一重要过程。数字化工具虽然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可视化内容，但难以传达传统授课方式中那种师生之间的默契和文化氛围的浸润。国学学习不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文化气质的培养，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需要借助长期的实地体验和人际互动。

又如情感教育问题。情感教育旨在培育学生丰沛情感、审美心灵和正确价值观，特别是使人形成立体完整的生命认知。这些能力的发展通常需要通过面对面互动、真实生活体验和集体活动来实现。尽管数字化工具能提供某些模拟场景和互动平台，但在完全替代真实环境中的情感交流和体验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例如，理解他人情感和在复杂社交情境中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更多依赖于实际社交互动而非单纯的数字化学习。特别是共情能力的培养，需要真实的人际接触和情感交流，这是当前数字化工具难以全面模拟的领域。

认识到教育数字化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价值，而是提醒教育者需要在数字化教育和传统教育方式之间寻求平衡。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同时，应当保留并强化那些有助于培养文化底蕴和共情能力的传统教育元素。例如，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提高国学学习的趣味性和可及性，同时保留面对面的讨论和实践活动；在情感教育方面，可借助数字平台拓展学生的视野和体验，但同时应确保提供充足的真实社交互动机会。这种平衡策略有助于充分发挥数字化教育的优势，同时弥补其在情感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的潜在不足。

## （二）降低负作用：教育数字化携带的“机器污染”及其应对

教育数字化徐徐携带着“机器污染”，即工具技术本身对人的身体、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潜在破坏。首先，比较显性的是，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给学习者带来了诸多身体健康隐患，如视力问题、颈椎病等。更为严重的是，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大大减少了学生在现实场景中的同伴交往、亲子交往、社会交往等，这必然影响学生社会能力和情感发展，甚至导致“数字孤独症”等问题的出现。其次是算法规训，即数字化工具中的算法在第三方操纵下产生同化公民的效果。数字化教育环境中，学生长期接触的不仅是知识内容，还有隐含其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这些数字化内容往往是由算法推荐或预设的，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或局限性。例如，某些教育软件可能过分强调竞争和效率，而忽视合作和创新的重要性。长期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价值观可能被不知不觉地塑造，形成片面或偏颇的认知。其本质是由算法推荐技术引发的道德认知偏差问题。教育数字化过程中过度依赖各种算法进行学习内容推荐、学习效果评估及学生未来发展预测。然而，这些算法并非完全中立，可能包含开发者的无意识偏见，或因训练数据局限性而产生偏差。例如，某些算法可能对特定背景学生产生不利的评估结果，从而影响其学习机会和未来发展。

除了上述问题，不恰当的数字化教学方式可视为“机器污染”的一种显性问题形式。表现为部分教师过分依赖数字化工具，将其视为“进步”象征，而忽视教育本质需求。2024年9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面向教师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和《面向学生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教师框架着重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旨在确保教师能够负责任且高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学生和社会的潜在风险。学生框架则为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课程开发人员提供指导，以培养学生有效使用人工智能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我国教育管理部门亟须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素养体系，制定政策法规，规范教育数字化进程。同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科学监管机制，形成全面的监管体系，确保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为教育事业提供有力保障，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人才。

### （三）破除虚构扭曲：教育数字化浮现出的“文化幻象”及其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生态的不断扩张，现代性价值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输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改变由隐性走向显性，由传统向现代演变。培根用“幻象”一词指代那些引人误入歧途的不良思想习惯，其列举了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剧场幻象。当下，新的“文化幻象”正在悄然兴起，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文化幻象主要表现为在网络空间中广泛传播的、对现实社会进行失真或虚构呈现的信息和行为模式，其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潜在危害性。文化幻象的形成与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特性密切相关。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即时性和广泛性为各种信息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为虚假信息和扭曲现实的内容创造了滋生的土壤。例如，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完美生活”展示，往往只呈现生活的光鲜面，而忽略了现实中的困难和挫折。这种选择性呈现容易导致观者产生非现实的期待和比较心理，从而影响其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

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少年更易沉浸于网络环境，受到各种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割腕党”现象作为一个极端案例，体现了文化幻象的负面影响。该现象最初可能源于某些群体的政治诉求表达，但迅速演变为一种网络亚文化。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成人与儿童界限的模糊化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成人群体在无意识中将其固有价值观念直接应用于实践，这一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界限的逐渐消解。这种界限的模糊化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部分青少年可能出于对关注的渴望或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心理，模仿网络亚文化中的自我伤害行为。由于青少年群体价值判断能力还不完善，“割腕党”的出现，不仅直接危害个体身心健康，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模仿效应，对整体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

文化幻象的潜在影响可能加剧社会分化，增加不同群体间的误解和对立，从而削弱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创变合力。因此，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必须警惕文化幻象的负面影响。消解文化幻象的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做的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大先生”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扎实的知识基础。通过发挥“大先生”的作用，可以有效应对文化幻象带来的挑战，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数字化是当前人类教育变革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推进教育现代化都离不开教育数字化的关键支撑作用，某种意义上，教育数字化可以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没有教育数字化，就必然不会真正建成教育强国，这是世界教育强国的共同历史经验。但是，我国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教育数字化风险，需要通过西方教育现代化这面镜子，深刻洞察和反思教育数字化对社会道德与伦理、人的价值与意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教育人文等带来的巨大挑战。只有始终坚持反思精神和辩证理性，才能让教育数字化保持在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好的教育数字化才具有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真正功能，好的教育数字化应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道与器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对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逻辑必然。



周光礼

## 以评价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来源 | 《教育研究》2024 年 12 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周光礼

2024 年 7 月 18 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构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不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成教育强国的根本要求。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推进”。大会对加快建成教育强国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探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这为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强国内涵提供了指引，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秉持这六大特质。

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国外有认识论与政治论之争。布鲁贝克( Brubacher ,J.S.) 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前者强调以“闲逸的好奇”追求知识，不追求功利性的“外在的目的”；后者主张探讨高深知识不仅是出自闲逸的好奇，而且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为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它强调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永恒的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使人解放的力量。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为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强调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追求“有用”的知识和学习谋生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社会化”、“个体政治化”的工具。

中国对高等教育基本属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展了“教育本质”大讨论，引发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争。前者认为，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属于经济基础。现代产业形态以科技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特征，要求劳动者必须掌握高深知识和科学技术，高等教育是培育新质劳动者的关键要素。后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教育属于精神生活，它受制于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界将“经济基础”等同于经济属性，将“上层建筑”等同于政治属性，出现了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之争。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领域的基本逻辑是权力，经济领域的基本逻辑是利益，文化领域的基本逻辑是真理，高等教育旨在追求真理、发展学术，

因此属于文化领域。这种观点影响深远。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教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随着教育的民生属性日益凸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教育从文化领域移到社会领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都重申了教育的民生属性，强调教育是民生之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前提和基础。2024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独立成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属性。正如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多重职能，其必然也具有多重属性和多重定位。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教育的三大属性，即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这为我们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提供了基本遵循。

### （一）从教育的政治属性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思政引领力

教育的政治属性强调教育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等教育是关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同政治有直接联系。

自古以来，教育与政治就密不可分。《学记》有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意思是说，建设国家，管理公众事务，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事情；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风俗，一定要从教育入手。也就是说，教育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Plato）是第一个系统阐述教育与政治内在相关性的思想家，其《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均有对教育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系统阐述：政治是教育的目的，教育是政治的必要手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继承了柏拉图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教育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强调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城邦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东西方历史上，政治均被理解为伦理道德，政治的最高目的是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教育也被理解为伦理道德教化，其最高目的也是使人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这样政治与教育就统一起来了，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这句话不仅强调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而且主张教育的宗旨是立德树人，即以“修

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德配天地”的至善境界。直至现在，人们在讨论教育与政治关系时依然聚焦教育政治社会化问题。所谓教育政治社会化，是指培养政治人的过程。从个体角度看，是培养政治公民，使其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从社会角度看，是通过各种教育和影响，将一定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公民，实现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认同，培养公民的忠诚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评价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上升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强国的“思政引领力”特质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二）从教育的人民属性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民生保障力和社会协同力**

教育的人民属性强调教育要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教育的三大属性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从理论上来看，教育的民生属性与人民属性针对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教育的民生属性针对的是“教育产业化”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教育置于文化领域，随着文化领域的全面产业化，人们提出了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产业化奉行的效率优先原则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在这种背景下，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教育置于社会领域，强调教育是基本的民生，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提出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概念，即教育领域的基础性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基础性、发展性四个主要特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实现人的终身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教育的人民属性对应的是“教育为谁服务”问题。“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是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从“精英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高等教育”进而迈入“普及高等教育”，精英主义（卓越）和平民主义（公平）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高等教育是为少数天赋异禀的“天才”服务，还是为普罗大众服务？前者强调，高等教育内在的深奥性决定了其是少数人的特权；后者主张，高等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人人应该接受的教育。在为少数“天才”服务方面，2009年，中国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珠峰计划”），“元培学院”、“清华学堂计划”、“竺可桢学院”等一批精英学院被建立起来。在为普罗大众服务方面，教育部自2012年先后启动了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以下农村学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以及头部高校的“圆梦计划”，这些计划影响深远。应该说，教育的人民属性为解决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取向开辟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我们办人民的教育。1941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强调这种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它应该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满意的教育有两个维度，一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公平的教育，二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有质量的教育。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高等教育强国的“民生保障力”和“社会协同力”特质彰显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政策逻辑，体现了教育的人民属性。一方面，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办好公平而又有质量的教育，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树立系统观念，强化全党全社会要相互协作、相

互支持，系统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 **（三）从教育的战略属性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和国际影响力**

教育的战略属性强调教育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强国建设之基、民族复兴之基”。高等教育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优先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将重教与尊师紧密结合。“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近代以来，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中国将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凸显了教育在长远发展中战略性、前瞻性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等教育的战略属性集中体现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关乎作为经济基础的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高度相关。随着人类的产业形态由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转变，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与创新，越来越依靠高等教育。“当一个国家产业形态以创新密集型产业为主时，经济发展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当前，美国以创新密集型产业为主，高等教育与工业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嵌入区域创新体系的创业型大学，进而形成区域科技、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美国东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周边的128公路高科技产业带以及西部加州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周边的“硅谷”就是典型代表。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独立成章，一体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教育定位于经济领域，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落实高等教育的战略属性,一方面,通过赋能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努力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强国的“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和“国际影响力”特质,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战略属性。强化教育的战略属性,一是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二是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三是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大旗,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把中国建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 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统筹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六项改革原则,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深度变革。

### (一) 轻微变革与深度变革

国外有学者根据变革发生的难易程度,将高等教育变革分为轻微变革和深度变革两种类型。轻微变革一般发生在技术层面,包括轻微的改进或调整,又被称为一级变革。轻微变革的实施过程常常是线性的,因而没有太多误解,也不需要更多的行动者参与。深度变革又称为二级变革,是一种涉及基本价值观、假设、结构、流程和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变革。轻微变革是科学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根据科学管理理论,轻微变革发生在局部时空,变革的过程是理性的、线性的,个体管理者对变革起决定性作用;而且,推动变革的是内部因素,不是外部环境。

这种变革是积极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变革过程是一个由目标、实施、评价、改进构成的行动蓝图。深度变革是社会认知理论和文化理论关注的焦点。社会认知理论强调意义建构和组织学习在变革中的作用，认为深度变革之所以难发生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或认知图式各异，对周围环境的解读也非常不同。在社会认知理论看来，变革的关键是领导者如何通过提供解释框架来影响个人的思想，以及个人如何解读和理解变革。文化理论强调，变革是对人文环境发生变化的反应，基本价值观和假设对变革过程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变革需要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社会认知理论和文化理论的一个共同假设是，变革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非线性、非理性、不可预知、持续和动态等特点。

## （二）从发展型改革到治理型改革

在中国的语境中，轻微变革和深度变革对应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型改革即局部改进，治理型改革即综合改革。前者强调问题导向，后者强调系统集成。正如《决定》所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径是“跟跑”经济体制改革。正如高等教育改革要处理好“发展与治理”两大关系、“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可以梳理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发展型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调通过“先行先试”激发教育主体活力，旨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治理型改革不是简单取代发展型改革，而是强调在推进发展型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正视改革积存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发展型改革强调问题导向、“先行先试”，治理型改革坚持系统观念，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治理型改革，发展型改革便难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型改革的持续推进以治理型改革为支撑，在治理型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发展型改革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分为发展型改革主导和治理型改革主导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以发展型改

革为主线，通过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办学活力，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应该说，早期的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下以市场机制激发办学活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聚焦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方针指引下，市场机制被逐步引入高等教育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允许高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之外招收部分委培生，从而使学校获得政府财政拨款之外的经费。随后，国家又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旨在扩大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规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学助考机构，这是中国民办高校的前身。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与此相呼应，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高校要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据此，教育领域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价值观，直接带来了学费快速上涨，高校办学经费从依赖政府拨款向依赖学校创收和学生学费转变。在这个阶段，基于市场机制，国家通过高校扩招、创办独立学院、创办新高职院校等政策举措，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治理型改革的兴起。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被提上日程，“系统观念”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统筹推进”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关键词。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对考试评价制度和招生录取制度进行系统设计，推进综合改革，旨在通过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等方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试招生制度。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了配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得以印发，提出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2020年，中共中央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的，围绕政府、学校、用人单位、教师、学生五个主体“五破五立”，做到政策系统集成、举措破立结合。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建设教育强国。应该说，过去十年是治理型改革逐步确立的十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富有成效的十年。展望未来，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旗帜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的深层变革。“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呼唤深层变革，治理型改革是推动深层变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治理型改革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筑牢根本制度和完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重要制度。另一个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为主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为中心，启动系列改革措施。在教育发展上，聚焦结构优化，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在科技创新上，聚焦畅通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人才培养上，聚焦政府与市场协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 三、以评价改革牵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的改革。育人方式改革以办学模式改革为前提，办学模式改革以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为前提，在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

况下，育人方式和办学模式改革难以取得应有成效，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系统论。教育评价改革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以评价改革牵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突破口。

### （一）以学生评价改革牵引育人方式改革

育人方式改革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支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改革的中心论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立德”的教育、“铸魂”的教育；二是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是“树人”的教育、“育才”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一定是育人与育才的统一，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当前，中国高校育人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科为中心，重视显性知识的传授，忽视隐性知识的习得。这种育人方式培养的学生“均值大”、“方差小”。“均值大”是指整齐划一的显性知识传授提高了学生的知识积累的平均水平；“方差小”是指显性知识传授的教育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导致拔尖创新人才的匮乏。

要改革这种育人方式，必须破除学生评价“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不良导向。育人方式改革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聚焦促进学生能力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此，学生评价改革要破“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具体到评价体系改革，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查。二是在大学生学业评价上，更加注重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推进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考查。三是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差异化选拔办法，完善科学识别特殊潜质学生的机制，拓宽中高考特殊选拔通道。

### （二）以教师评价改革牵引办学模式改革

办学模式改革以跨界融合为中心，建立上下贯通、内外协同的高水平人才培

养体系是改革的中心论题。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以及贯通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当前，中国高校办学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封闭办学，不仅学段与学段之间不贯通，而且学校与社会之间也不贯通；不仅高校内部学院之间、学科专业之间不开放，而且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也不开放。导致这种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学科专业壁垒森严。习近平总书记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21年在清华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

要改变这种封闭办学模式，必须破除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导向。办学模式改革要聚焦交叉融合、跨界协同，由基于学科的教育向跨界融合的教育转变。无论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还是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教师都是关键因素。为此，教师评价改革要破“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立“潜心教学、全心育人”。一是坚持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评价的第一标准，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执着于教书育人；严格落实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学术不端“零容忍”。二是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奖项、唯帽子、唯项目”的顽瘴痼疾，突出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导向，建立标志性成果认定机制，以前沿突破论英雄。三是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完善教师激励、约束和退出机制。

### （三）以高校分类评价改革牵引管理体制变革

管理体制变革以高校分类改革为中心，建立纵向分层、横向分化的多样性高等教育体系是改革的中心论题。强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是全球性趋势。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不断分化，以多样性应对多元化的挑战。当前，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面向政府办学导致高校的同质化、千校一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脱节，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联，进而产生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

结构性难题。高校同质化导致高等教育体系整体功能不断弱化，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要改变同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推进高校分类评价。通过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准确定位，办出特色。高校定位的核心是聚焦，是差异化：要聚焦自身特色，集中有限资源打造比较优势；要差异化，使自己与别人不同。为此，必须强化高校分类评价改革。一是建立高校分类体系。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功能，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二是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分类支持。三是破除资源卓越观和声誉卓越观，建立学生发展卓越观。资源卓越观和声誉卓越观是高校模仿性同构的主要原因，它们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只有些许的相关性。建立多样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树立学生发展卓越观。学生发展卓越观强调，卓越取决于学校要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潜能的能力，最卓越的高校就是对学生知识和个人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学校。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价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不谋而合。

#### （四）以政府评价改革牵引保障机制改革

保障机制改革以市场为中心，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体系是改革的中心论题。高校获取资源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官僚控制模式，即高校的办学资源控制在政府及其官员手中，政府通过计划拨付保障高校资源；另一种是市场导向模式，即高校的办学资源被控制在无数消费者手中，高校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办学资源。由官僚控制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是保障机制改革的新方向。中国高校保障机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计划配置，这种配置方式导致资源的稀缺和不讲效率。保障机制改革要统筹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激发高校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推动保障机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必须改革资源配置模式。高校资源获取方式影响高校行为。高校同质化的底层逻辑是官僚控制的资源配置模式。高校是资源依赖型组织，办学资源的计划配置导向使得高校面向政府办学。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基于管理主义导向，将高校分成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专科院校三个层级。由于不同层级获得政府划拨的资源不同，导致专科院校想升本科、独立设置的学院想改大学的趋同化行为。要改变这种趋同行为，必须建立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其关键是评价改革。不正确的评价导向会带来反向激励。为此，必须强化政府评价改革，总原则是要破“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立“推进科学履行职责”。一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追求卓越，办出特色。二是坚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布局，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三是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强化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总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场涉及结构、过程和价值观重大改变的深度变革，这种变革是一种只有深刻理解其意义才能推动的治理型改革。要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三大属性（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重要论述。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具有思政引领力，教育的人民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具有民生保障力和社会协同力，教育的战略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具有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和国际影响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深层变革，需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实施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改革。育人方式改革以学生为中心，办学模式改革以跨界融合为中心，管理体制以高校分类评价为中心，保障机制改革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中心。评价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积极实施以学生评价改革牵引育人方式改革、以教师评价改革牵引办学模式改革、以高校分类评价改革牵引管理体制改革、以政府评价改革牵引保障机制改革的新思路。

申国昌

## 书院治理的中国模式与历史经验

来源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03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秘书长 申国昌

近年来关于“治理”概念的研究成果较多，有学者认为其源于西方公共管理学范畴。“教育治理”也大多基于西方语境下对治理的阐释，进而迁移至教育领域。所以，对中国古代是否有治理或教育治理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有治理，而且有教育治理。《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郑玄注：“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言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已蕴涵着多元共治的理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治”为河川名；“理，治玉也”，“理”指加工玉石。清代段玉裁进一步注解“治”和“理”。前者指小沽河从山东莱州掖县阳丘山（马鞍山）经治理向南流至平度州东南，与出登州黄县的大沽河合流，后至胶州麻湾口入海。“按今字训理，盖由借治为理”，这里的“治”有治理、疏

通之意。后者作动词时，指雕琢剖析。“《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角思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顺着璞石的纹理进行雕刻，即使再坚硬，也能加工成玉器。还引申为“善治”。“理”作名词时，指腠理、文理等。追根溯源，中国语境下的“治理”，自古以来便含有管控、管理、疏理与多方协调、多元共治的思想内涵。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语境，更不能将其作为准绳去衡量、审视或评判中国教育治理的内涵与实质。

以唐代为嚆矢的中国传统书院，源于古代私学但不囿于私学传统，它吸取了私学与官学的办学经验，兼容佛道精粹，博采众长，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兼具“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尤其是书院有机整合了私学的自主办学、自由研学与官学的制度约束、规范管理，具有民主管理和规范管治结合、多方协调和多元共治并举的鲜明特征，成为中国教育治理的历史渊藪。本文希冀以中国传统书院为例，尝试探赜其治理模式，挖掘和阐发中国古代教育治理的时代价值，把握中国大学之根，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 一、中国古代书院治理的文化根基

延绵一千多年的传统书院，承继了中国古代修书、编书、藏书和传书等传统，发扬了私人讲学的“绛帐”遗风，汲取融合了佛道及诸家文化的精华，形成了自身发展特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书院，其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也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佛道为侧翼，包含法、农、兵等诸家各种文化。因此，书院治理也以儒家治理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其他各家各派治理之长。通过剖析中国传统书院治理的文化基因，探求书院治理的历史延续、文化取向与价值追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教育治理的内在品质与路径选择。

### （一）以儒家文化为治理之本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着

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也形塑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活动”。治理主体的意识形态为儒家化，怀揣“尚和合、求大同”的治理思想，秉持“德主刑辅”、“崇仁尚礼”、“隆礼重法”、“中庸之道”、“内圣外王”等治理理念，采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辅之以法”等治理方式，体现了趋善求治、以善治善等治理特征，遵循了治理中的合理规律，使治理呈现出有序状态。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主义文化，德治有助于维持良好秩序，是实现善治的有效手段，是儒家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以“德治”为本，发扬人本主义精神，将德性置于最基础位置，强调超越性道德在治理上的优先性，主张“道德自觉的修养方式”、“道德教化的治理方式”和“道德强制化的治理方略”。在自觉的道德和伦理意识基础上，还采取“礼治”和“法治”等手段。通过外在规则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约束，明确社会分工和职责，强化他律，法治着力，使个体行为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并按一定的秩序、方向和路径运作，从而使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开展。因此，书院治理文化呈现“德主刑辅”的基本意向，以德治为本，兼用礼治法治，提倡贤人治院，注重构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 （二）借佛教禅林的传经之道

佛教寺院的兴盛，官学的式微，激发了士人振兴与发展儒学的热情。为恢复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儒士上继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私学学风，延续私人自由讲学和学术创新的传统，在与佛教抗衡中，吸收采纳佛教禅宗、精舍丛林等聚徒讲学和传经授道的形式及经验，创建了书院这种新型教育组织。书院不仅仿效佛家寺院将院址选择于山林胜地，以便潜思进学、陶冶性情，还借鉴佛家禅林隐括供祀、讲学和藏书三位一体功用的基本规制。更为突出的是，书院的学规章程等一系列规约制度颇受佛家禅林清规启发，如朱熹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超越禅林清规的基础上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书院的教学制度同样受禅林讲学制度影响，如不同于个别教学与官学教学形式的“升堂讲说”、隆重严肃的“开讲仪式”和迎接山长副讲的“初至礼”等，以及书院为了标榜学派、培养学风和道德教化所举行的祭祀活动，虽与寺院异源，但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反之，寺院禅林制度也深受儒家教育思想启发。可见，儒佛两家长期互相渗透与交融，共同构成了古代教育治理传统的一部分。

### （三）采纳道家倡导的无为之治

中华传统文化包蕴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的理念。《庄子·天道》云“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强调精神层面用无为的方法治理，而在物象层面，治理具体事务时采用有为的方法。无为治理和有为治理是双重机制，无为而治统率有为而治，有为而治服从无为而治。后来诞生的管理概念，也仅是内圣外王治理学中“外王”的一个子系统，属于有为治理的一部分。前已解释“治”本身即含有治水、整治、修治之义，而“理”表示按照物质天然具备的纹理进行剖析，强调尊重和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突显顺势而为、无为而为的效用。所以道家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顺其自然、与天地合其德的治理思想，主张“以无为而治为体，以有为而治为用”的治理理念。遵守天道的自然法则秩序，乃治理坚守的根本准则。书院吸收道家治理精华，遵循教育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遵守天道的自然法则秩序，强调无为而为，主张教师较少干预，生徒以自学自修为主；倡导还权于生，鼓励生徒自治并积极参与书院治理。

### （四）承袭民间社会治理传统

中国古代民间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无论治理主体、治理模式，抑或治理内容都有鲜明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治理文化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性，民间治理主体正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自身的功能，甚至以自身的行动在缩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整体性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间社会治理主体如士绅，取得秀才初级功名和官学正式身份，入仕为官员，未入仕居故乡被称作“居乡土大夫”。“在中国文化史上，士大夫是代表整个社会心理的阶层，它对于舆论、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于士绅受到官方认可，具有一定文化和身份地位，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并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所以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士绅举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教育，参与倡办、主持和资助地方书院，与士大夫、士子等士人一同构成“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多种社会力量交互与共同推动下，书院吸纳社会中更多元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到决策中来，

实现权力的分散化，在各权力主体之间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点，以便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及引领社会发展，体现了治理主体多元化。而且身为地方精英代表，士绅所掌控的绅权也为书院自治提供了基础力量。

## 二、中国书院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

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是古代书院治理的生命线。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的书院，能够在发展中不断自我更新，适应周遭环境的变化，在博弈抗衡中吸收和融合众家治理之长，以儒家治理文化为本，借用佛教禅林传经之道，采纳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承袭民间治理传统，从书院、社会、政府纵向多层面，山长、职事、生徒横向多维度，形成了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模式。

### （一）山长主导书院治理

书院是一种视知识权力为主导地位的组织，治理也基于权威。从书院运行的整体把握和掌控来说，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书院执掌者，这源于对书院最高执掌者极大信服而产生的自愿顺从。身为书院的精神领袖和领导核心，山长是肩负招生、教学、学术研究、学生规范管理及书院发展的灵魂人物，在书院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体现了书院的核心使命，从组织上确保了书院的有序治理。

“任何治理都必须依赖于人，只有贤人才能真正促进治理的完成，从而达到一种良好的治理”。由于山长既要承担书院的主要教学任务，也肩负整体组织和治理书院的职责，其道德水准、学术造诣、管理能力关系书院的兴废盛衰。所以，书院非常重视选聘道德学问、社会背景、朝野声望与人品学识俱佳，且具有卓越领导力与广泛学术号召力的名儒宿学作为书院最高执掌者，以便率先垂范。基于“内圣外王”的逻辑起点，书院倡导“贤人之治”，认为山长是道德完人和知识精英的“君子”，其个人品格与书院治理必然相关联。只有德才兼备的学者才能推行德治，不仅以德修身，而且以德治人、治事和治院，更体现“推己及人，顺而治之”的儒家忠恕之道。如清康熙年间白鹿洞书院提出，“礼聘海内名儒，崇正学，黜异端，道高德厚，明体达用者主之，无则不妨暂缺”，对山长聘用要求极高，宁缺毋滥。

即使普通书院选聘山长也有较高要求。学问之深、行义之优是必备条件，正身勤德更优于出身，如此才能倡率诸生，更是维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可靠保证。

作为书院的灵魂人物，山长选拔诸生，主持教务工作，按时按例进行教学，传道授业。如明道书院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以孟仲季月分本经论策三场）。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而且山长亲自督察、管理和评价诸生学业。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写道：“继自今，吾与诸生一月一相聚于学或于书堂，必欲亲扣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已别牒教官、堂长，凡所讲习，当先就本心本身上理会，使之鞭辟向里。有不善自觉而改可也，有所觉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爱而守可也。”山长在教学过程中不强硬灌输知识，对生徒实行指导性教学，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针对某个问题或生徒的困惑之处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要求生徒不能死记硬背，应各辟蹊径，有所创见。“每日上堂讲书，务宜沈心静气听讲，不拘四书、五经、诸史，诸生有独得心解者，录出送掌教就正，有疑者不时登堂质问”。山长注重培养生徒发现问题、独立钻研及自主学习的能力，鼓励生徒积极思考，启发生徒思维，倡导无为而治。“诸生听讲之后，必须回讲，或令其另讲一章一节，观其识解议论，即可觐学力深浅。若三次讲不合理者，对众斥辱；明通者，记赏”。山长通过生徒回讲或另讲所学内容，评定其能力情况，并进行相应奖惩，还亲自主持会讲、校勘刊印出版经籍以及祭祀等事务。总之，山长统揽院事，约束院众，在其主导治理下，书院有序开展各项具体工作。

## （二）职事辅助日常治理

随着书院的不断发展，教学活动、学术研究、藏书、刻书等业务工作以及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等行政事务与日俱增。为维持院务有序进行，书院在山长主导治理下，设置了诸多职事，由教师、学官、诸生、士绅等任专职或兼职来分担山长的日常教学、学术活动和行政等工作。如白鹿洞书院聘学长分管礼、乐、御、射、书、数、历律等教学任务；聘副讲“主批阅文字，辨析疑义。合无礼聘本省通五经、笃行谊者为之”，选择通晓四书五经、身体力行者担任书院副讲，

负责批阅诸生作业，日常功课答疑解惑等教学辅助工作；增聘管干、副管干各一人，“专管洞内一切收支出纳、米盐琐碎、修整部署诸务。即于洞中择有才而诚实者为之，不称则更易”，选聘诚实而有才干的人担任管干和副管干，专门管理书院财务收支出纳、后勤食物保障供应、修葺书院建筑等工作，若不称职，可以及时更换；聘典谒二人，“专管接对宾客及四方来学者，察其言貌动静不系匪类，然后通刺副讲，副讲以为可，然后引见主洞。庶混滥一清，匪人不得托足，学人皆有观摩，且无供给不贖之患。择洞中言貌娴雅者充之，按季更易”。书院还聘用有关学术活动的职事如会主、会长、知宾、司录等，分别主讲学术活动、评阅修改文章、记录书院讲学和会讲情况以及负责接待来宾等工作。此外，还有专职职事如首事、司事、司书、修书等负责财务、藏书、刻书等工作，后勤杂务职事一般由首事公择选聘勤谨可靠之人，常年驻院。各时期所设名目繁多，如学仆、院役、司阍、司祝、斋夫等。

书院职事设置合理，并不断加以分化与整合，涵盖了教学、研究、行政管理、后勤及财务等几大条块，行政管理系统严格，组织管理制度日臻完善，逐渐形成堂长负责制、会长（会主）负责制、斋长负责制、学长负责制、总办领导下的监院负责制等职事负责制来辅助山长完成书院治理。“堂长、学长、斋长诸职又相与励翼之”。各职事责有专门，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配合，与山长共同维系着书院的正常运转，从而使书院治理环境愈加稳定。治理主体间责任明确，目标一致，将不同品质的人才安放于与其德才和司职相匹配的位置上，配置得当，各安其位。在权力边界内依规履行责权利，协调不同主体权力关系，提高各个治理主体参与书院治理积极性，全面提升了治理效能，实现横向治理有序化，体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这正是礼治的有效运用。

### （三）生徒自主研修自治

儒家治理提倡治己与治世同构，治己即修身治理，“修身治事，修身治世，修身治国，修身平天下”，这是道德在生命体内真正诞生的必由之路和成长历程，符合人类生命价值观的本质，符合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与价值观。通过修身治理实践，实现天人合一，进入无为而治的境界。因此书院提倡山长指导下的自学

制，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自学为主，倡导自我研修、独立思考和时相讨论，以获得个体的德行道艺之实，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认同。书院“最重要的精神为自修。各人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及，自己去研究；学者山长，不过备顾问而已”。生徒自主自修还积极参与书院的管理及教学，是书院治理的一大特色。书院吸收老成持重、擅于理财、长于交际且学有专长的年长生徒参与书院日常管理乃至教学工作。大多书院择优选拔肄业的生徒担任学长、堂长、斋长、管干、司计、典谒、经长、掌祠、掌书、司录和引赞等职事，被称为“职事生员”，主要负责考勤、稽查学习勤惰、课堂实录、搜集疑难、劝善规过、辨疑析难、刻书校勘、图书管理、协办考试、祭祀典礼、迎宾、稽核斋夫门役等事务工作，也领相应的津贴。其中生徒担任最多的职务是斋长，因为诸生朝夕相处，易于稽查。“必须公同选举学校中端方通雅之儒，俾为诸生表率。如有事故，另行公举，不得私相代谢”。明清时，较大的书院也设副斋长、协力斋长等职事，以协助斋长工作。

书院还会选聘优秀的生徒担任堂长，如白鹿洞书院聘堂长“主诱掖，调和洞中学徒，尊巡行，督视课业勤惰。主洞、副讲即择学徒之优者为之，不称则更易”，负责奖掖后进、协调矛盾及督促检查课业等工作。或选择学行老成的生徒为会长负责会文。先由会长评阅诸生文章，再由同学互评，彼此交流畅谈、各抒己见、相互裨益，同侪共进。如明朝天启年间瀛山书院，“士既幼学，必须壮行，胡可师心自用，而不课文之为兢兢乎？请于诸友中择一学行老成者为会长。每月三会，每会书一、经一、诗论表判策各一，务要篇数俱完。先呈会长批阅，次与同会互正，须各倾倒知见，以相裨益，不得阿附雷同，亦不得长傲拂善。如此则道日以明，德日以进，他年黼黻皇猷之具裕诸此矣”。也会选生徒担任司纠，择老成持重的生徒稽查众生徒之善过，类似现在的宿舍寝室长，进行自治。如明道书院在《学规》中规定：“每斋或四人或五人，必择老成持重者一人为司纠，稽察一斋诸友之善过而登记之，己之善过又赖同斋诸友纠察之，以斋房不在一院，恐监院、斋长不能遍及也。”亦有书院选居院被保举的老成之人担任司计，主管钱粮；或任掌书等职事，负责领阅缴还藏书等书籍管理工作；或兼任辑稿、编排、初校、复校等工作；或担任祭祀典礼、习射仪典的职事；或掌管院中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筹备与管理事宜等。由于中国传统书院组织机构较为单一，专职管理人员较少，

因此生徒可直接参与书院治理。这一举措,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治理效率,对生徒而言也是很好的教育与锻炼,更体现了民主的组织治理文化氛围,被视为我国教育治理史的一大进步。

#### (四) 士绅参与书院治理

来自各地士绅、商人等民间力量,创设、兴办、修复书院,捐田、书籍、钱物等,给予书院充分的经济支持,保障了书院的运行。士绅作为书院治理的主体之一,为社会参与书院治理提供了必要基础和作用空间。

一方面,建立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董事制度。随着官府逐渐淡出书院具体经营活动,书院形成了以董事制为代表的管理体系。董事制形式多样,有官府监督、向士绅负责制,有董事按年轮值、向民众负责制,有官府监督、董事分工合作制,还有监院负责、董事按季轮值制等,均强调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董事会设监理、董事等职事。“董事甚难位置,几经焦思。非品望功名最上者,则无以达官情而镇众心;非依阉轮当,亦恐无以襄事务而均众心。计惟就诗山公举品望功名最上者为总董”。通过民主推选公正士绅为监理,主要负责监察监院、账房等;选公正勤谨、家境殷实的士绅为董事或董理,以防贪占院产。还按所管不同事务性质,细分董正、董副、总董、监院董事、营造董事等。书院选聘董事会成员严格,以专责成,分工合作,共襄书院公事,共同治理书院。

另一方面,董事积极参与书院治理。首先,管理经费,这是首要职责。书院以董事会为主,管理书院的各项财产,经费管理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相互监督,保障书院有序运营。“书院出入账簿,议立三本,一本存置书院账房,一本交常董二人收执,一本交值年董事收执。会课及聚议交账之时,各携账本至书院,誉清核对,每年总结”。若有侵吞牟利行为,一经查出即行革退。董事还负责学田经费管理,尽心竭力,兢兢业业,严格遵照章程执行,不得徇私枉法。士绅加入书院管理,与官府共同管理经费,且逐渐控制经费支配权,成为经费管理的主导者,官府则渐渐转向监督和控制,从而形成“官民共同管理,各司其责,而又相互制约”的机制。其次,集体协商公议、选聘山长。若山长不符合要求,书院绅董还可以向官府呈明辞退之。清光绪年间孝感西湖书院,掌教由“首事绅衿访择本邑品学

兼优之举人、进士，公举聘请，住院训迪，其非举人、进士，毋得延膺讲席，如文品不符公论及各衙门荐非本邑之人，许绅士呈明辞退”。董事参与山长的延聘，经过遴选、协商、公推、商知和禀请等环节，充分体现了共治。最后，负责管理生徒出勤、日常教学辅助及后勤工作等日常院务，如负责考试事务，登记、发卷、散发点心、筹办饭食等。民间士绅力量参与书院治理的有限自主权力，有时足以限制官势，使封建专制丛林中透出一缕民主之光。

### （五）政府强化治理

中央政府在书院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统治及培养人才，统治者对书院发展予以支持。主要采取御赐匾额、赐予书籍、赐拨学田和经费、授官于山长、直接参与兴建和修复书院、褒奖私人捐资助学等自上而下的强制治理方式，体现了权力为主导、秩序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如康熙书“学达胜天”匾额赐予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华阳书院、五曲书院，书“学宗洙泗”匾额赐予紫阳书院等；雍正拨帑千两给各省城书院。书院也将获得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认可视为一种殊荣。在皇权的号召下，各级地方官员纷纷捐钱拨田，同士绅合力倡办书院，投身于文教振兴事业中。地方政府官员创建、修复及扩充书院，并奏请朝廷为书院修广舍宇，或拨置官田或公款给书院，或带头捐资，这亦获得统治者默许。如明成化元年，南康太守李龄于白鹿洞书院旧址增建房舍，延聘理学名家胡居仁入洞掌教；长沙知府钱澍于成化五年修复岳麓书院等。在朝廷的支持下，使得书院“几遍天下”，数量大幅增加，发展速度快，分布地域广，但也导致书院自主治理权逐渐减小。

随着中央集权加深，统治者要求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对书院从间接扶持发展变为直接控制，开始主导掌控书院办学领导权、师资延聘权、招生权、经费使用权，还设置监院，举行官课，以监控教学过程等。如元代书院山长直接由官府任命并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明清时期山长选聘主导权依然多数掌握在官方手中，形成由各级官吏选聘和考核山长的体制。这虽有助于提升书院教师政治地位，一定程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稳定，但消极作用更甚，贪腐徇私现象频生。书院招生也由山长全权定夺变为官府决定，不仅规定招生名额，还直接参与招考及甄别择取。生徒

只有经过政府官员稽察把关、层层筛选方可入院。如河南开封彝山书院规定：“未过本州县考者，不准在书院肄业。书院甄别取定肄业诸童名数，由监院造具清册，每月官斋各课，挨顺等第名次抄写。某课续报，注明月日，添写于后。逢官课前一日，监院即将此册呈送轮课衙门查看。甄别、复试分两场，取定正副随课出示，择吉送学。肄业诸童于送学后三日内具名柬赴院长、监院处拜谒，责成斋长指名传唤，如传唤仍不谒见者，扣除。”而且肄业生徒需经地方官吏推荐，并经监察机关考核，方能被选聘为吏属或教官等。统治者对书院的控制愈加严密，行政权力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书院自治权受制于行政权力，官学化和科举化日渐浓厚，独立性质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学术创新和教育变革的性质和特色，传统的书院精神逐渐丧失殆尽。

### 三、古代书院治理的中国经验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持中贵和，重整体倡协同，“要达到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人格追求、伦理观念等方面认同，这就需要人们具备协同性的道德和精神，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协同性行为”。传统书院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治理主体，强调和合共生，建立治理共同体，形成以山长主导治理、职事辅助治理、生徒自修自治、士绅参与治理、政府强化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各个治理主体各尽其责、各守其道，共同承担着书院各项事务治理的责任，权责明晰，实现了书院的高效化、有序化运行，凸显了善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可见，多元共治是实现书院价值和彰显书院精神最契合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发扬书院内部的个体之善、集体之善及组织之善，也为中国教育治理史提供了丰富经验。

#### （一）秉持自由自主的治理本旨

传统书院发端于私人藏书读书之所，很少被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中，“虽与政府发生关系，却不受政府的支配，讲习方面比较自由”。书院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办学与管理自主。自由自主是书院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书院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得以生存的根本诉求，亦是书院治理的起点。书院的行政管理与教学研究等一般由

山长负责，尽管官府会予以资助，但较少介入书院内部管理事务。因此，书院在师资聘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选择方面自由度较高，可以自行决定聘用职事人员，且明确任职资格及要求，严格选拔过程。在生徒管理方面，书院选拔生徒注重资质、志趣、学养等，并有相应考核标准。录取之后还根据生徒不同年龄与成绩等次进行分类，通过分层管理和区别对待的办法，进一步发掘不同层次生徒的求学潜力，激发其积极奋斗的精神。书院成为由一个山长和若干教师组成的自治组织机构，管理服务教学和研究，队伍精干，行政高效，很好地实现了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保证书院正常运作，产生“外谐而内不乱”的系统整体效应。

## （二）夯实行稳致远的治理基础

正所谓“物不备不足以集事，赏不昭不足以作人；然则劝学兴化，固宜谋及经费矣”。书院的璀璨，很大程度依赖相对独立的经费保障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视为书院办学生命线的学田制。学田主要来源于皇帝敕赐、官府拨置、民间捐输或集资购置、书院自筹等，这是书院赓续千年、维系不辍的经济命脉，是保障书院开展各种教育文化活动的先决条件，更是决定书院在山长选聘、招生考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学术自治等方面拥有足够发言权和管理自主权的前提，为书院自主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费供给。

因此，书院历任执掌者非常重视学田经营与管理，确立各项规章制度、整顿院章、聘请财务专职管理人员、厘清田产、明晰佃户租谷并详细记载于征信册等，以便稽查。如将田亩经费揭诸碑石，或刊印成册分存于官府、吏胥、绅民、士人之手，或载于书院志或地方志，还建立相关人员、存储、收支、簿书等制度，以确保书院资产不被侵吞。同时对书院日常费用开支情况登记入簿，一式多份分存于官府县属、绅董、监院、斋长等，做到财务公开透明，以备核算，以达到“与众保之”的目的。书院购买学田也有相应翔实规定，购买之田产要符合要求，严格农户租田流程，详细记录每年收入等，如湖南云山书院“各处租谷，每年秋收首事亲自过量，年清年款，不准折扣，亦不准将田私顶。如遇虫伤水旱，必先报知首事，验明酌减。无虫伤水旱，租息不清，扣规另佃，刁抗送究。其租谷佃规原有额收，首事不得任意加减”。这不仅确保了现有资产完整，而且争取获得更多经费以充实书院，使书院生命力强劲，维持久远。

### （三）追求共治善治的治理鹄的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其基于儒家治理文化，“以追求善治为鹄的，以推行德治而著称”，提倡善治，包括“目的的善”、“手段的善”及“主体的善”，强调达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终极目的。书院治理主张以德性规范作为优先手段，要求治理者本身善，才能达成德风善治的效果。可知，“儒家的善治指向每一生命个体，就是要培养个体道德高尚”，重视道德至上的价值选择。

书院治理也只有扎根在个体的修身正心、道德自我等主体性挺立上，才真正抓住了根本，所以坚守育人的个性化品质是书院教育的底线守护，追求善治德治的治理鹄的是书院治理的价值导向。由此，书院治理可以追求价值关怀与知识相统一。书院推行德治，将提高人的良好道德素养、实现人生的价值意义置于教育首位，培养“道德个人”，突出以德育人，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体现“人文化成”的精神实质。书院治理关切如何将生徒培养为自由主体，如何使个体内在道德潜能发展为与天地合德的宇宙精神，注重人格的塑造与德性的涵养，从而体现“修道”之意旨。书院注重培养圣贤之人，坚持为己之学，回归教育人才的本质。强调生徒人格教育，要求生徒追求人格完善，醇化道德品格，重视道德与学问并进。《提学郑廷鹄示主洞教谕崔栢贴》中指出：“讲学修身，然后及人，此洞学大旨也。愿诸生以致知力行为一事，以进德修业为良能，庶不负先贤垂教之意。”因此，书院强调生徒要崇德笃学，为己修身。以德和善为中心，闪烁着道德理性光辉。

### （四）依托章程规约的治理路径

制度是书院权力场域形成和发生作用、维系和调整各种力量关系的合法性保证，是书院治理的重要依据。书院制定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学规、学则和章程等，将治理经验上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治理体系，全面体现了书院治理的内容，是书院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书院教育已进入成熟的发展形态。规约和章程为实现书院自治提供制度协同保障，才有关于治理的可能。大多数书院制定了学规学则等办学准则，涵盖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学生道德修养、

日常生活行为、治学态度和方法习惯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具有相当的完备性和翔实性以及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起到了某种为书院立法的作用。学规从宏观层面规范书院生徒应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及道德修养方法，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个体的基本要求；学则是从微观上细致规定了生徒治学过程中所遵守的生活、学习和礼仪规范。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学规学则操作性强、针对性强，条目切中时弊，贴近生活，极易为生徒理解和接受。师生共同遵守书院所订学规的各项要求，相互监督。书院学规“以学术知识为根本性质，在法理上均获得政治权威的特许，在制度价值上均为传播与研究某种学说设置一定的教育教学行为规范”。章程不同于学规宏观远大的追求，更多强调做法的细密性及可操作性，内容涉及：师资延聘、薪资待遇和职责所在，生徒招考及录取；教材选择、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讲会组织、程序及内容；经费筹措、管理与开支，图书整理与借阅、书刊印刷与出版，职事员工配备与责任等。其意在从各个方面去维系书院的正常运行。如清同治年间的《致用堂章程》对经费用项和支放、师长延请、监院遴调、课期定准、赏罚分别、礼法修明、立匾刊文、胥役管理等皆作了翔实而刚性的规定，具体生动地反映出书院各项规章制度及治理水平的高低。依循学规章程，治理过程规范化、制度化，体现了书院“善治”凭“良法”。

### （五）择取开放共享的治理方式

书院采取开放共享的治理方式和路径，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书院学术治理的必要条件和内在要求，是书院办学精神的必然体现，对外开放的平台和系统功能随着书院的发展不断完善扩张。

一是讲学制度开放。自由讲学的传统使书院具有开放性。在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学界泰斗登坛讲学，宣传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理论，相互激荡与融合。

二是生徒来源开放。书院招生不论门户，兼容并包，打破了贫富贵贱的身份性限制，改变唯官家子弟是教的教育传统，不计出身门第，不拒贫困孤寒；同时不拘一隅广纳生源，打破招生的地域性限制，推动教育从“学在官府”向平民化发展，使民众普遍受到“居家爱国而名大小之序的教育”，真正做到有教无类。除对生

徒有品德及学业的基本要求外，不限年龄、地域、种族和阶级身份。“远方寒士贫无所就，师友贫无供需者，公咸资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书院给予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相对平等的求学机会，而且书院生徒拥有选择师长的权利，甚至可中途易师换校。硕学鸿儒于不同书院巡回讲学，求学之子不远千里，闻风负笈而至，积极向大儒靠拢。

三是向民间社会开放。书院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陋习，面向民间社会开放。“陆子静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下者”。重兴后的明代书院大多面向公众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下层民众也能广泛参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文化素养。书院治理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传播了文化，启发了民智，起着社会教化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与系统”。正是基于开放共享的治理逻辑，才易于书院建构灵活开放的教育治理体系。

#### （六）坚守学术自由的治理理念

书院组织呈松散状态，既保证了学术共同体中每个“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又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活力，为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和学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学术自由是实现书院精神的主要途径，是书院学术治理的动力源泉，持守学术自由的自治是书院得以存在的根底。“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后期，一直承担着学术研究的重任，其研究主要以传统知识为主，注重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形上’之学的研究，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书院的文化氛围与学习风气相对宽松，是一个自由探讨学术的场所，孕育了形态多样的学术思潮。因此，书院治理深受学术文化影响，具有学术文化的印记。

书院在处理各项事务中尊重学术权威，体现治理的学术属性。书院极力提倡自由论道，设置以学问为重的讲会制度，倡导不同学派的辩论和争鸣，推崇取长补短的学风，求同存异。首先，不同书院具有不同学术取向，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书院通过鼓励各方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道，从而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长，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次，讲会不仅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活跃了学术空气，拓宽了生徒学术视野，提高了书院办学水平。最后，书院鼓

励争辩诘难。“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术人的自主性，强调学术治理行为的自律性。无怪乎胡适对书院的取消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总之，堪称古代教育精髓的中国传统书院，之所以弦歌不绝，传承千年，其治理模式与制度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书院秉持独立自主的办学精神，主张名家掌校；坚持教学与研究并重，将讲学与著述融为一体；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式办学形式，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强调学生博学多思、自主探究，不仅培育了众多精英人才，还有力推进了学术繁荣，诞生了诸多中国学派。如此的治理理念、培养格局与西方中世纪大学遥相辉映。中国传统书院在遵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模式。因此，在建成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重拾并挖掘传统书院的治理经验，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将书院的遗风余韵有机渗入现代大学治理，对重构中国式大学治理意义深远。



付卫东

## 多措并举提高教师培训质量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5年03月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付卫东

如何更好地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成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课题

要从教师培训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等方面入手，进行标本兼治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全国两会期间，中小学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成为热点话题。2010年以来，教育部、财政部持续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国培计划”）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素提计划”）等国家级培训计划，至今已累计

培训教师校长超过 2000 万人次。我国已经建立高等院校、市县教师发展机构和优质中小学校等协同联动的教师培训体系，“国培计划”形成了“省级规划、市级统筹、县级落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中小学教师 5 年 360 学时全员培训制度，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师培训模式，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教师和优秀教师。如何更好地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帮助在职中小学教师提升学历，成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课题。

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此，需要从教师培训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农村教师培训改革、推动教师培训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入手，进行标本兼治。

一是深化教师培训的供给侧改革。大力支持各级教师培训机构进行教师培训，高校设立教师教育学科，建立教师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在专业发展、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予以倾斜。加强国家、省、市、县、学校培训机构的有机衔接，明确各级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和投入责任。强化地方教师培训机构职责范围，激发地方政府、地方教师培训机构、学校协同参与教师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地方教师培训协同合作的良好生态系统。

二是进行教师培训的需求侧改革。完善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的正向激励机制，在培训费用、培训时间和培训奖励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提供优质、灵活、便利的培训渠道，采用送教下乡、工学交替等方式，有效缓解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的工学矛盾问题。针对教学中的实践问题，通过设置工作坊、案例研究专题库、行动研究专题库等形式，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兴趣；建构真实的教师实践场景，如开展课堂教学模拟和演练，改革微格教学等方式，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反思实践能力。

三是推进农村教师培训综合改革。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师培训是整个现代培训体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亟须改革。完善教师培训组织机构，建立市级教育学院和区县教师培训体系，实现“有处可训”；改革农村教师培训经费分摊机制，进一步增加农村教师培训经费，实现“有钱可训”；培养一批接地气、有能力的高素质培训教师，实现“有人可训”；建立培训按需筛选机制，防止培训稀缺资源

过度集中；制定发展性建设标准，设计引领农村教师发展的培训项目，实现“训到实处”。

此外，推动教师培训的数字化转型很有必要。各地应加大优质的数字研修资源供给，建立覆盖各学科，满足城乡、区域及不同发展阶段教师需要的学习资源库，支持中小学教师自主学习。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的研修功能，建立教师学习“数字档案袋”，实现中小学教师数字化学习“一人一档、一人一册”。搭建教师网络研修平台、开设在线名师工作室、组织远程教师研修活动等，利用网络打破时空限制，对教师常态化同步开展校本培训、教师技能培训，实现教师共培训、共成长、共发展的目标。



刘训华

## 疗愈与生活：海洋叙事的教育意蕴

来源 |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01月



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研究员、海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训华

人与海洋密切相关，人类的身体是一部海洋史。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存在着自然海洋、意念海洋、文化海洋和遗址海洋等4种海洋形态，海洋叙事依此而生。人类存在于一种经验世界，叙事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它起到与世界、与自己沟通的功能，宣示存在感和理性启迪是它重要的价值依归。叙事具有抚慰人心的重要功能，内心孤寂加强了人类表情达意的内在冲动。借助人海互动交流，海洋叙事可建构从自然、人文到情感、意志的个体世界。基于教育价值，海洋叙事通过日常生活，形成从生活、想象到疗愈的全过程体验，是实现人海和谐的主要路径和提升海洋素养的重要方式。

## 一、海洋是人类情绪疗愈的重要资源

情绪是人类对外或自我交流的自然产物，人类对海洋的依恋体现为家园感和根文化，海洋是人类情绪疗愈的重要资源。

### （一）海洋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资源

海洋先于人类而存在，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资源，人海交流首先体现在行动上。大约四千年前，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出现在西太平洋，作为一个真正的航海民族航行到大洋深处，这也许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接近海洋民族的人群。他们在小岛的海岸上安家，偏爱海滩、半岛，甚至是沙洲，而不是山谷、高地和丘陵。他们掌握的所有精巧技能——撒诱饵、下网、修堰，尤其是划独木舟——都是为临海而居量身定制的。涉海活动是海洋叙事的先导，是人海叙事的开端。

现代快节奏并且内卷化的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和心理要求都很高，当前从大中小学生到成年人，对于学习或工作的意义感、价值感认知发生新变化，更加凸显从物质追求向精神追求演绎的大趋势。海洋文化是人类重要资源之一，如南海观音、妈祖文化作为意志海洋、文化海洋的重要内涵，对个体的人来说，具有文化和精神的双重意义。

### （二）海洋叙事的概念及其实现形式

海洋叙事是人海互动的主要方式，是以海洋为内容并基于海洋阅读、海洋旅行等活动体验的内在表达总和，其包括亲身体验和借代体验两种形式，总体上指向人的内在需求。亲身体验是指海边散步、冲浪、潜水、临海而居等涉海方式；借代体验是指通过海洋书籍、海洋遗址、海洋文化、海洋音乐、海洋美术等非直接海洋体验形式所形成的海洋叙事。在借代体验中，海洋阅读是最为常见的叙事体验和方式。

在海洋叙事中，人类通过阅读海洋类书籍形成有关海洋的情感、心理和想象，并以此暂时离开现实社会。海洋书籍具有可视性、在场感、隐喻式、程式性。比如海洋叙事对于人们阅读海洋文学的激励作用，“第一次由波利尼西亚回来时，

我就已经确定了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包括来自南美洲的早期移民，但是当时我也确信，现在也依然相信，另有一拨东南亚的移民抵达了波利尼西亚，并与当地早期的居民混血”。海洋书籍的涉及面广泛，既包括海洋专题，也包括所有涉海内容。在阅读海洋书籍时，人容易徜徉在海洋特定的世界里，享受和理解其喜怒哀乐。芸芸众生有着对海洋的想象与渴望，也有着人世间种种离情别绪。人世间的种种不开心是基于人类心理的常态。心理痛苦（情绪痛苦）被定义为一种不愉快的、难以承受的、令人不安的内在体验。情绪痛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恐惧或惊恐、悲伤或孤独、羞耻或羞辱。阅读海洋书籍可以缓解或替换人的心理痛苦和情绪痛苦，使人在更广泛意义上具有超越性和情感体验。

海洋旅行是另一种重要的海洋叙事形式。旅行作为人们的一种特殊生活，是一种追求幸福、疗愈自我的生活方式。当人们面对心理压力过大或情感危机而产生心情低落或烦躁易怒等情绪问题时，旅行疗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处于海洋叙事的涉海旅途，则更能发挥积极的心理疗愈作用。自我疗愈是个体解决自身困惑、形成强大内在力的重要手段，是个体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心理平衡的过程。

### （三）海洋给予人的重要意义治疗

接触海洋可以赋予人类以博大、宽广、无垠之感，给予人以意义治疗。意义治疗是针对生命表面的无意义而陷入存在绝望的患者所采取的基于意义唤醒的相关措施，意义治疗技术被称为去反思和矛盾意向，两者都基于人类存在的两个本质特性，即人的自我超越能力和自我分离能力。现代社会容易造成存在的空虚感，比如躺平主义者，有一种是由空虚和无意义感而构成。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问题。所有生命来自海洋，人类也是如此。“人类从海洋中诞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起始于羊水，它的成分和海水几乎完全相同。我们最初的形态和鱼类相似。一个月大的胚胎先长出鳍，而不是脚”。海洋与人类存在天然的亲切感。

海洋文化作为海洋叙事资源，它通过海洋想象建构给予人天地巨变之感。比如考察“沧海变高原”的青藏高原，寻找古海洋时期青藏高原的贝壳、土壤等海洋遗存，这既从物理层面增强历史感，又从意向层面使人感受自然伟力。

海洋资源丰富多彩，自然的、精神的、文化的、历史的资源都是海洋宝藏。中下扬子地区二叠系化石十分丰富，如碳酸盐岩中的藻类、有孔虫、放射虫、海绵动物、珊瑚、三叶虫等，硅岩中的海洋动物化石及其碎片的原地堆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史前古海洋图景。沧海化为岩石，对七星街下二叠纪的沉积环境进行分析，还可发现其属于局限海，水流不畅通，水动力条件较弱，沉积物中有灰泥、球粒、孔虫。在动辄以百万年为量度的时间面前，这种古海洋的海山巨变，给予人类一种宇宙洪荒的自然伟力。

#### （四）海洋情绪疗法的理论与实践

海洋叙事作为个体重要的调节方式，具有自我疗愈的正向功能。海洋资源通过海洋叙事形成的情绪疗法，是构建人类情绪的疗愈力量。情绪聚焦疗法（EFT）主要聚焦在抑郁、创伤和婚姻困境等方面，强调转换痛苦的前提是直面痛苦，只有先触及情绪体验，才可能用更健康的情绪替代不良适应情绪，最终实现效果持久的改变。桑多尔·费伦齐在《塔拉萨：生殖力理论》（*Thalassa: A Theory of Genitality*, 1924）一书中，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拓展为他所谓的“生物分析法”。其主旨就是费伦齐所说的“向海洋回归的逆流”（*thalassic regressive undertow*）——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海洋为诗人和科学家所推崇，被奉为生命的起始和源头，而万物也终将回归大海。

由于哺乳动物的胚胎是在羊水中孕育，而羊水又恰好是胎儿在母体中孕育时所需的营养液，据此，费伦齐认为，这是人类在生理发育过程中需要找到海洋替代物的表现。费伦齐表示，胚胎发育的这几个月会持续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人的睡眠和性行为都和胚胎发育的状况大有关系。费伦齐认为，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提出的“毁灭与死亡驱力”理论也可以被理解为海洋在迫切地召唤我们，唤我们回归本源。

## 二、海洋叙事对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有效触发

海洋叙事对人最直接的作用在于海洋素养的培育，从而形成基于人海和谐的

情感关联。海洋对于人类身体和精神的触发，是人海叙事的基础。人类无论在身体还是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宽广的海洋，其足够容纳下整个个体世界。

### （一）海洋将人置于一种新的环境之中

对于人类个体来说，海洋叙事包含亲身体验和借代体验两种形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人们适当参与海洋活动很有必要，对人的生理与心理大有裨益。类海洋的替代品，如青海湖、赛里木湖、乌伦古湖、太湖等大湖泊，同样给人以类海的浩瀚之感。人在宽广的自然资源面前，容易获得意义上的再定位。海洋自带与人类亲近的基因，与人共生共体。海洋与人之间有着一个中性浮力，大概在100米左右，当压力和浮力相等时，身体处于失重状态，人进入氮醉状态。往脸上泼凉水是使人精神振奋的有效方式，它唤起了人内在的生理变化。

人类对于海洋的依恋，体现了一种家园感和根文化感。“由于更偏爱内陆的安全感和思维方式，哲学家日益放弃了对海洋的探寻，转而将它交给了海洋生物学家、探险家和诗人。但是，诗人偶尔会连同精神分析学家一起，将我们带回万物的本源——海洋”。伴随人性、神性、悲剧性、无边的灾难之海与有限的生命这些主题，读者可以跟随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荷尔德林、梅尔维尔、伍尔夫、惠特曼、尼采、海德格尔、谢林、费伦齐、弗洛伊德论述探寻人类与海洋的复杂关系，揭示我们的冲动、焦虑、死亡和爱。“长浪、波浪、洋流、潮汐……只有一部分水体运动是在海洋表面可见的。更重要的涌动都深藏在海底，距离之远、规模之大，超乎人的想象”。这些思想使人徜徉于无边的海洋，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海洋给予人类意志力和向前的勇气，它可以将人置于一种新的区域环境之中。“一觉醒来，不会游泳的我，发现自己躺在一艘简易木筏上，身边是5位同伴和1只鸚鵡，所处的位置是太平洋海域，而今天，已经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第101天了……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死，我也要为了这个信仰死去：死在船帆上，像一个绳结”。亲近海洋，不仅是在意识层面唤醒人的海洋意念，更是在生理层面使人精神回归，它将人海互动在思想中加以体现，并形成强大的行动力量。

生理是有限的存在，心理依然如此。给予人生理上的满足感，是奔向大海而

形成的涓涓细流。在与海洋的互动中,潜水作为一种直接的方式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它使人脱离日常生活情境而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海洋细节当中,在生理得到超越的同时,也对心理安全产生积极影响。“陆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测绘,大部分已经被开发,其中太多已经被破坏,只有海洋保留着最后一片人类不曾见过的、没有触碰的以及尚未开发的旷野,是这颗行星最后的边界”。人们在试着逃离最初的心理阻碍时,形成生命的自觉意识。

人类真正进入海洋世界是打开了另一扇认知的大门,它是对人“生命总开关”的触发。“生命总开关”概念是由生理学家佩尔·朔兰德 1963 年提出,指当人们将脸埋入水中那一刻,大脑、肺部、心脏及其他器官被触发的种种生理反射,“当这些哲人般的自由潜水者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们的双眼漠然呆滞。这种神情就像你在佛教徒眼中看到的一样,或者像急诊室里那些已经濒临死亡,几分钟后又 被抢救过来的病人的神情。这些人到达过另一个世界。而最奇妙的是,潜水员们会告诉你:‘这扇门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人在海里潜水时,就有这样的感觉。

## （二）通过海洋阅读建筑精神家园

海洋阅读既表现在海洋文学、海洋绘画、海洋舞蹈、海洋音乐等形态中,也体现在其他一切对于海洋的文字记载中。人文科学提醒我们,有些人对大海的了解来自想象,但他们对海洋的了解未必不及曾在或正在海上工作的人们。海的表面混沌、朦胧,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反射回来的恐惧与欲望。海洋阅读的价值在于构建读者的精神家园,帮助人类暂离现实世界,使人们脑海中的诗意与浪漫共存。

唐宋之后,随着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人们祈求航海中的太平,宋代有了妈祖这一海神形象。人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所依赖的海洋,当前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远不及对太空的探索。人类向海洋进军力度的加深,造就了海洋科学和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海洋人文社会分支学科的兴起,并出现杂交和整体化趋势。海洋里有许多人类的未知,不但有地球上最大的山脉、最深的沟谷、最大的滑坡、最强的火山爆发,在发现一系列自然之最的同时,人类从海洋中寻求慰藉也从未停息。囿于海洋科学和实践的有限,海洋给予人神秘莫测之感,

这些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在冥冥中增强了人海交流的潜质。在海洋没有被人类完全巡视之前，11世纪的中国诗人苏轼被贬谪海南时就有天涯海角之慨叹，这是一声人文的叹息。

### （三）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学的价值引领

海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既无处不在，又往往被视而不见。我们需重视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学的价值引领，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海洋文学”太少，问题是：第一，西方文学是更多还是更少？第二，这个“少”从何得知？所以我们在下判断时不能是思维定式，还需要加以比较，实际上中国文学存有众多海洋元素。语文教材是中国文学传播最广泛的载体，比如笔者曾做过统计，在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统编本1-6年级语文教材中，就有100处左右的海洋元素，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海洋思维，以便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中发现海洋。海洋阅读是最主要的海洋叙事形式，也是我们在生活中遇见海洋的重要方式。

以海洋为意向的文学考察，如走访青海德令哈的海子诗歌纪念馆，可了解海洋对于诗人创作及诗歌意向构建的重大推动力，这推开了从诗歌视角了解人的海洋心理的窗户。海洋叙事需要培养人的情绪钝感力。钝感是一种才能，各行各业中成功人士大都能自如地收放他们的钝感力，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从斥责和质疑的声音中跳脱出来，并且毫发无伤。开展海洋阅读是培养人的情绪钝感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其来培养人的博大胸襟，使人更能坦然面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困境。热爱海洋的人不用等别人来告诉他海洋有多重要，即使我们住在远离海洋、感觉不到和海洋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它也仍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存在，我们吸入体内的大部分氧气和摄入的大量蛋白质事实上都来源于海洋。海洋以外在之姿、内在之魄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 三、生活中通过海洋形塑人类精神世界

平凡是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征，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自然海洋、意念海洋、文化海洋与遗址海洋等叙事方式，形成海洋对于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并在人海互动中形塑人的精神世界。

## （一）对日常生活的经验超越

人类的日常生活是由循环维度、超凡维度及情感意义维度等3层维度所建构，其中情感意义维度是在平凡、超凡基础上的意义整合，情感意义维度即是进入特定主体生活的方式，具有个体性特征。日常生活常被认为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平凡，是一种“活着”的概念，对平凡的中断和超越平凡更能体现日常生活的意义，海洋对于日常的超越就具有可操作性。

日常生活中的海洋叙事在于真实、真情、有章法地“原生态”再现人类所经历的生活状态，而海洋进入叙事经纬，成为拉开现实距离的生活议题。走访海洋遗址是开展海洋叙事的重要方式。例如，青海湖古称“西海”，考察青海湖的人文风貌及当地“祭海台”的祭祀文化，走访“古代海洋”活化石——茶卡盐湖、翡翠湖，可以了解当地民众对于海洋和海神文化的认知，探讨物质依存与海洋文化之间的时空链接，感悟海陆人生。

在史前文明时期，人类对海洋认识不足，主要借助神话和鬼怪想象来形成对海洋事物的日常建构。文学给予海洋日常意义，《太平广记》一书中涉及海洋叙事的篇目有73篇，建构了一个立体、多层次的海洋世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等写尽古代士人的志向与豪迈。《苏莱曼东游记》是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所撰的见闻录，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游记，在公元851年汇集完成，该书揭示了唐代东西海上交通贸易日趋发达，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开始，呈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生活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过程中用中文写作的一部日记体著作，他从公元838年7月日本博多湾登船出发一直写到公元848年1月从中国回到日本博多湾，历时9年7个月完成，内容涉及日本遣唐使的架构、入唐使船的构造、来回航海见闻、中国大陆沿海地理等内容。《马可·波罗游记》是公元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记述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长篇游记，他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对15世纪欧洲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航海家读了该书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促进了大航

海时代的发展。这些作品呈现了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古代社会海洋世界的生动描写。在生活中，人们通过阅读海洋书籍来链接古今中外的天地人海。

## （二）海洋叙事形塑精神世界

海洋遗存在陆地上普遍存在。通过在新疆鄯善县红石矿区出土的贝壳化石等海洋时期遗存可知，在我国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亿万年前是海洋，后完成沧海成高原的巨变，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依然眷恋着海洋。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誉，又称“净海”，其地还有西海星空、点将台等名称，赛里木湖状态极像海洋，有海洋的波澜、气势，又避免了海洋的灾害，湖与海在人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世界中融为一体。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的乌伦古湖，又称“福海”，面积广大，“海浪”滚滚，当地人们设有“福海渔场”，从事海洋水产养殖，“新疆海鲜”一度成为网络热词。新疆有北疆海岸、黄金海岸等称呼，新疆虽是离自然海洋最远的地方，但新疆人民对于海洋的渴望丝毫不输内地，往往越是看不到就越渴望。“海纳百川”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特征，以海洋特质赋予历史上各族人民的融合，正是海洋博大、精深、一统、融合的生动写照。

文化与历史经纬相联是海洋阅读的根本。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枢纽敦煌兴起于陆地体系，作为海洋体系的参照有反向思维价值。敦煌的衰落是由于泉州、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壁画中众多佛教故事所形成的经变及其海洋元素，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对海洋理解的映射。敦煌壁画中有一些观音与海难的故事，如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和第217窟东壁盛唐壁画中的“观音救海难图”，是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大海的恐惧、海难频发和观音信仰的生动描写。壁画表现了佛经的航海内容，如《报恩经·恶友品》中的善友太子入海求宝，《贤愚经》中的海神问难等，然而壁画中的海船几乎全部是游船，可能与壁画所表达的佛教和平思想有关，同时因敦煌地处大漠戈壁，人们见到的只是舟筏，虽然受佛经内容、画师阅历和壁画布局的限制，但不影响古代中国人对于航海印象的建构。

## （三）海洋文明具有时间刻度

人类文化根基在海洋。2013年在浙江余姚发现的井头山遗址距今7800-8300

年，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史前贝丘遗址，对研究中国海洋文明起源具有重大价值。由于海洋边缘不断形成陆地，过去的海塘就变成了内陆，在上海奉贤华亭海塘和宁波镇海后海塘都有海塘遗址。相对而言，始于雍正三年（1725年）形成的奉贤华亭海塘保存了较好的历史遗迹，海洋叙事具有时间维度。

时间、意义、价值和存在不仅反映在人有限的生命中，也体现在海洋遗址叙事里。当人们置身于具有7000多年历史的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的田螺山遗址时，会通过遗留在现场的干栏式建筑的木根、残存的陶片、众多的海洋生物残骸等无声的形体叙事，跨越七千年与海洋相遇。海洋叙事将七千多年的时间、人、事、情感融合在一起，七千年的时光在一个维度上呈现。当生命的计量从仅有的百年寿命延展至千年时光，这一刻人也找到了时间的意义，找到了超越我们固有生命的价值存在，这也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加速对平凡、平庸的肢解，将人从日常琐碎中解脱出来，并间接地达成人类因对日常生活不满足而形成的意义疗愈。

海洋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形塑，是依赖文化所产生的力量 and 意义感。“在海中没有移动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推特，没有电臀舞，没有会丢失不见的车钥匙，没有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会被遗忘的生日，没有信用卡欠费的罚单……生命中的所有压力、所有喧嚣、所有让人分心的事情，都被留在水面上”。海洋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但其更大价值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漂移。尽管海洋的自然条件变幻莫测，在相当长时间内较难适宜人生活，但从更广义上来说，人海互动对于人类而言形成了一种物化的精神世界。海洋文明是实现海洋疗愈的基础性资源，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

#### 四、海洋疗愈的教育意蕴

海洋的宽广及其所体现的海洋叙事具有积极的教育隐喻，人们通过海洋叙事形成个体的疗愈力量。任何事件的意义都是个人的建构，它包含着个人对事件的评价，情绪作为一种更为一般的联系网络的组成部分而在记忆中予以表征。海洋疗愈的教育意蕴具有文化、心理和生活的三重指向。

## （一）在文化指向上，建构更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诗意愿景

海洋叙事的教育意蕴在于给予人一种意志力量和意义治疗，帮助人建立起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人需要通过某种外在方式来疗愈自己，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的“药物”就是自我对话、自我疗愈。海洋是人类对陆地视野的自我超越，是基于陆地世界向人的经验世界的生命蠕动。维克多·弗兰克尔提出发现生命意义的3种主要方法：一是通过寻找工作或做事；二是通过经历某种事情、与某人相遇或者相爱；三是通过苦难，尤其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困难。人类通过海洋可以获得具有生命意义的那种意志方式。

对于中国人而言，向东是大海，海洋既是方向，也是意志。对海洋的哲学思考，为我们探究海洋奠定伦理基础。文明因比较而多元化，中华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互相印鉴，如对嘉峪关等古代边塞的考察，思考和见证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何以共生同长。

海洋给予人以生活意义，人的终极愿望是对生命的思考。《论语·公冶长》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对人生目标和意义的评述，总体反映人对于观点、愿望与生命的思考。这种思索从士人到帝王莫不如此。从秦始皇巡海射蛟，到汉武帝东临碣石，海洋始终是帝王天下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司马贞对刘彻的评价：“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这是个体的人对于生命的探索。跨越海洋是奔赴远方的一个信条。唐朝诗人韦庄在《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云：“扶桑已在缥缈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在古代印记里，跨越海洋跋山涉水，是一种信念与追求。当生活沉迷于鸡毛蒜皮之时，漂洋过海成为检视生活的另一种远方。

中国人对于海洋探索有着丰富的历史追求。诸如，从“剡木为舟”开始，人类逐渐告别传统的“腰舟”阶段；三国时期卫温、诸葛直率船队万人浮海远至台湾；南宋王室在海上的逡巡；元朝的海上贸易行动；明清近代的海事浮沉，呈现出中国航海的历史画卷。海洋既是生命的起源，也是人类思想的成熟地，到了近代以后更与国运相连。人类对海洋的感性认识最早来自描绘出大海的《地形图》，约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绘制；而最早最精确的海疆地图《禹迹图》绘制

于北宋时期，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刻制。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不断与时俱进，并创造出新的形态。

## （二）在心理指向上，形成海洋阅读的家园感与精神建构

海洋叙事的教育意蕴在于给予人类以海洋视野，以及超越陆地视角的品质与想象。海洋叙事需要借助时间，通过直接体验或者间接体验，形成人在生活和精神层面的泛在状态。逻辑科学思维模式关切的是从本质衍生一般法则，建构一个无论在何处都永远真实的事实世界，然而容易排除时间向度。海洋叙事以时间作为关联世界和人心的链接点。人们以海洋视野与思维看陆地，有截然不同的陌生；通过海洋叙事形成的海洋体验与海洋想象，在人们思维和气质层面起到精神形塑。费伦齐在《对生殖力理论的尝试》一书中谈到了“人类向海洋回归的逆流”，生命遇到的第一大危险不是溺水而是脱水，人类的生存、死亡与海洋交织在一起，在海洋的怀抱里完成了生命的统一。

海洋充满着传说和神奇，吸引着人类的探索目光。生物能量学认为精神领域有它的肢体根源，在每个人生命发展历程的土壤中两者互相作用，从而形成特定的人格，生物能量学对能量的认知是将人类视作一个与环境有关的能量存储器，手、脚、头和性器官构成人与环境的主要连接点，海洋叙事是发挥人能量的重要场域，即使在精神层面，同样构成受力面。据亚特兰蒂斯传说，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大西洲（Atlantis）、海洋里的万千世界，需要人们去追寻；从黑烟囱到白烟囱，对海洋的观测、思考和想象，需要科学家、哲学家、诗人、作家参与其中。在大西洋海域，地中海入海口的对面，曾经存在一座面积辽阔的岛屿，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史前文明高度发达的亚特兰蒂斯帝国的所在地——大西洲的残留部分。柏拉图提及的这个岛屿在历史中确实存在过，古埃及极有可能是亚特兰蒂斯的殖民地，现今的埃及文明翻版于亚特兰蒂斯文明，亚特兰蒂斯的消亡源于一次大自然的巨变，整个大陆以及在大陆上的多数生物从此永沉海底。这如同电影《海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明和神奇力量。但海底有火山爆发或者塌陷，处于不断变化中，即使是深海海底也不是万事万物的终点，而仍然是上下互通的双向世界。海洋中孕育着坚强的信念，中国古人相信，“天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

有时刻，故潮得以信言也”。而海洋人文美的教育意蕴，正是蕴藏于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内在再塑。

### （三）在生活指向上，形成自我疗愈、更新与发展的个体成长

海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对我们生活环境，特别是个体身心成长具有积极正向作用，海洋叙事是海洋与人、社会之间形成作用力的主要方式。海洋叙事具有一种天然力量，能够引发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海洋涉及宇宙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一系列冲击人内在心理的命题。从充满想象的故事中寻找价值依托，以海洋叙事来均衡人与生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这正是海洋叙事所赋予的力量。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瘟疫、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灾难后依然存活，并且活得越来越好，主要归功于人类社会的高韧性，而这种韧性很大一部分源于人类复杂的情绪。人类对于海洋的依恋，则来自于抽身现实生活的目的。在生活叙事中，还有一种大众过度反思，许多人热衷于观察自己，根据他们所谓的隐藏动机来自我剖析，并用潜意识心理动力学来解释行为。叙事是人类的本能，人作为天生的故事创造者和倾听者，将叙事予以生活化意义，基于海洋的主题，摆脱一般性叙事所固有的宽泛、平庸，进入到个人意义的层面。

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这既是社会命题，也是教育命题，是每个人特别是奔向中年不惑而知天命的探索。避免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体现存在的价值，是治愈人存在空虚的一剂良药。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见识、有所作为着眼，有所作为与成功学关系不大，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与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社会中的存在空虚包括那些遭受着无意义和空虚折磨的人。我们如何在深层的社会意识方面寻找精神和力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说，“对于那些不能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海洋是人类的强大隐喻，沉默而宁静，人与海洋在意识上密不可分，认识和回归海洋是人在个体世界建筑藩篱的内在动力，在海洋空间里，人们产生情感，产生联想和想象。

海洋叙事所形成的隐喻具有疗愈的教育意义，使其在意义、思维和疗愈方面

形成同一性。一旦隐喻被讲述者表达并被听者破译，与被确定的隐喻相关的活动和属性就会被当作辅助源和隐喻的支持。作为心理学根隐喻的叙事，海洋叙事具有心理的隐喻作用。海洋叙事是人海关系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人海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叙事。人海关系的存在与和谐需要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伦理关系等方面建立联系。在人类涉海行为中形成人海关联，产生影响和教育效果，这些效果是多方面的，对个体而言，就是疗愈。



## 盘点了 147 所“双一流”高校后，我们发现毕业于这所高校的“一把手”最多

来源 | 一读 EDU

编者按：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在春光旖旎的芳菲四月，清华大迎来它 113 岁生日。悠悠岁月间，清华大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卓越人才，他们中既有在全球科学领域留下辉煌印记的巨擘，也有在互联网行业引领风潮的企业家；既有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学者，亦不乏默默奉献于基层，心系民众的公仆。虽然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但心中镌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是激励他们勇往直前，不懈攀登的精神灯塔。在这群星璀璨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从清华走出，执掌高校帅印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清华精神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在学术领域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如何运用智慧勾勒未来图景？又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传承与发扬清华基因，影响无数学子的人生轨迹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本文将镜头聚焦于那些从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走出来的高校“一把手”们，看他们如何诠释清华的“烙印”。

高校“一把手”不仅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更是驱动高校前行的核心引擎，他们的领导智慧、教育情怀与执着奉献，对大学的发展方向、学术地位、人才培养质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繁荣，服务国家战略，乃至塑造未来社会面貌，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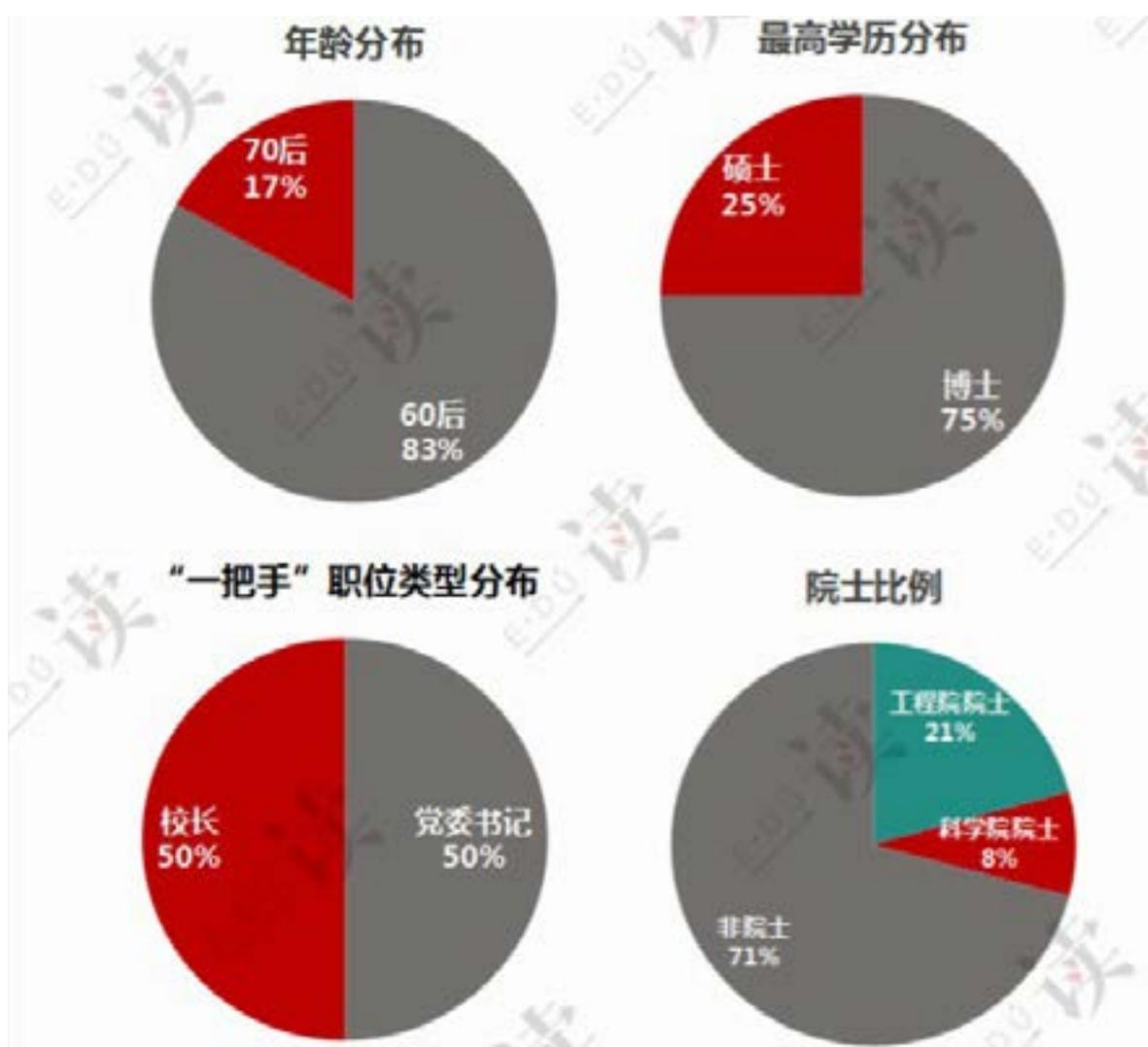
一读统计了目前所有“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部属高校的校长及党委书记名单（不含军校及公安类院校，数据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发现有 24 位高校“一把手”的教育履历中烙下了清华大学的独特印记。这一现象不仅凸显出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卓越的育人能力，也揭示了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人才库的重要贡献。

姓名	就职学校	学校类型	职务	清华就读经历
谭天伟	北京化工大学	理工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硕博
程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类	党委书记	本硕
王守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师范类	珠海分校校长（兼任）	硕博
徐坤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博士
熊四皓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工类	党委书记	本科
邓卫	湖南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本硕
刘仲华	湖南师范大学	师范类	校长	博士
周坚	华北电力大学	理工类	党委书记	硕士
吴剑平	华侨大学	综合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硕博
邢锋	暨南大学	综合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硕博
潘一山	辽宁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博士
单忠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工类	党委书记	博士
彭志科	宁夏大学	综合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硕博
史元春	青海大学	综合类	校长	本硕博
李路明	清华大学	综合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博
邱勇	清华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本博
杨振斌	上海交通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本硕
汪劲松	四川大学	综合类	校长、党委副书记	本硕博
孙宏斌	太原理工大学	理工类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	本硕博
姚强	新疆大学	综合类	校长	本硕
徐孝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工类	党委书记	硕士
崔唯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博士
易红	中南大学	综合类	党委书记	本硕博
高洪	中央美术学院	艺术类	党委书记	本科（第二学位）

这 24 位高校领导者中，60 后占 83%，充分展现了这一代人在高等教育领域积淀深厚且经验丰富的一面。70 后新生力量亦崭露头角，占比 17%，象征着高等教育管理层的新鲜血液正在逐步注入。最年轻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党委书记崔唯航和宁夏大学的校长彭志科，他们均出生于 1974 年；最年长的是新疆大学校长姚强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高洪，他们均出生于 1962 年。

在学历层次上，这批高校领导者四分之三拥有博士学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工程院院士和科学院院士加起来占比近 30%。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些院士型高校“一把手”凭借学术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以及在科研管理和资源调动方面的能力，无疑将有力推动学校整体学术水平提升、加强学科建设和提高学校国际竞争力的任务。



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求学路径，可以发现占比最高的是本硕博均在清华就读的“三清学子”，他们自本科便扎根清华，对清华精神和学术传统的深入理解和传承，使其在治校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有的高校领导是从其他院校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完成了硕士或博士的学习；有的是工作数年后，在清华获得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样的跨校研修经历无疑为他们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学术事业和多元的知识结构。

从专业背景来看，由于清华大学在理工科领域的显著优势，大部分具有清华大学求学经历的高校领导均为理工科专业背景出身，他们深厚的理工科底蕴为推动学校相关学科发展、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三位清华大学出身的高校“一把手”的故事。他们以其独特的教育智慧与不懈的努力，身体力行地诠释了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并在各自的校园里谱写了动人的教育篇章。

## 一、汪劲松：是“汪校”也是“汪帅”

汪劲松在清华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之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

是土生土长的“三清弟子”。毕业后，汪劲松留校任教，此时的他已经在机器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1995年，汪劲松晋升为教授，年仅31岁，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2004年，40岁的汪劲松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随后兼任研究生院院长。面对外界对其专攻科研教学更为能铸就辉煌学术生涯的惋惜，他毅然服从组织安排，走上了管理工作岗位，彰显了清华人的责任与担当。

在清华的近30年间，汪劲松度过了最好的年华，从学生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他在收获扎实的专业知识、完成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治理好一所大学。



汪劲松（图片：清华大学官网）

2009年，汪劲松从清华大学“空降”电子科技大学出任校长，只有45岁的他是当时985高校中最年轻的“一把手”之一。2013年，汪劲松临危受命，出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彼时的西工大，正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内部管理松懈导致官僚气息滋生，昔日雷厉风行的作风渐行渐远；外部竞争压力陡增，东部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相比之下，西工大显得步履蹒跚，发展滞后。对于委派汪劲松出任西工大校长，中组部当时是这样表述的：结合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际，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深入比较、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汪劲松掌舵西工大十余年期间，学校在办学空间，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研等方面均有所斩获。作为一所国防特色的 985 高校，西北工业大学参与完成了包括载人航天、空间站、深空探测等众多国家航天任务的科技攻关。在汪劲松的带领下，“十三五”以来，西工大获国家三大奖 20 项，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把“‘双一流’建设推向前进，实现西工大跨越式发展”，也由一句口号，变为了现实。

2023 年 2 月，汪劲松履新四川大学的消息发布，众多学子纷纷留言“还我汪帅”，表达着自己内心的不舍。在学生心中，汪劲松不仅是有着出色管理能力的“汪校”，同样也是有着超强人格魅力的校园男神。



汪劲松讲述川大青年的奋斗故事（图片：四川在线）

## 二、刘仲华：“跨界”又“越级”，茶学院士当校长引热议

2023 年 11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拟任省属本科高校正职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热议。

在此之前，刘仲华一直都在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长期从事茶叶加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致力于提高茶叶资源利用率等。在湖南农业大学，他先后担任茶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9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省委组织部在干部任前公示里面特别标注了是因为工作需要，将刘仲华从专业技术岗位调任到管理岗位担任领导班子正职。

有网友认为当院士就应该专注科学研究，不应该从政。也有很多人也对刘仲华院士担任高校领导岗位工作感到可惜。

纯技术岗位调整到管理岗位，既是“跨界”又是“越级”任命，湖南师大新校长刘仲华究竟有什么突出的能力？



刘仲华（图片：湖南师范大学）

从考入湖南农大学习茶学开始，刘仲华研究茶学四十年，在茶叶深加工与功能成分利用、茶叶加工理论与技术、饮茶与健康等领域有很高的建树。2008年，刘仲华关于茶叶功能成分提制新技术与产业化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又凭借《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再次斩获该奖，成为本世纪以来国内茶学界所取得的最高奖励。

院士担任校长有独到的优势。他们在科研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高校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的发育生物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学入选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动植物学进入ESI全球前1%。刘仲华教授作为一位农学领域的专家，他的学术成就和研究领域与湖南师大的部分学科设置比较契合。这样的调动说明，湖南政府对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寄予了厚望。目前国内的高校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湖南师范大学整体的发展速度比较慢，确实需要一位新的领路人，来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

刘仲华和清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高考时候。当时被看好是“清华苗子”的刘仲华，拿到高考成绩单的时候脑袋都懵了，不情不愿地填报了湖南农业大学果树专业，没想到最后被录到茶学专业。在湖南农业大学先后获得本科、硕士学位后，刘仲华留校工作，一步一步地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14年，刘仲华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也算是圆了少年时期“上清华”的梦想。



刘仲华教授走进湖师大附中为同学们带来“茶产业茶科技与茶生活”专题讲座（图片：潇湘晨报）

### 三、邢锋：历经五所高校，引领土木工程学科建设

1981年，年仅16岁的邢锋以内蒙古全区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成为化学与化学工程系的一名学生。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用了6年时间接连完成了硕士、博士的课程，成为一名“三清学子”。

从清华博士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工作，成为深圳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一名讲师。当时的深圳大学创办时间并不长，在建校初期，这所具有特殊地位的高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援建，深圳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就源于1984年由清华大学对口援建的结构与市政工程系。邢锋作为清华土木工程系培养的优秀学子，背着神圣的使命感，在深大任职20余年，从一名普通的讲师，逐步成长为深大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书记，以及深大的副校长、党委书记。而正是在他的主导下，深大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都成为学校颇具优势的学科。

作为国内混凝土结构研究的学术领军人，邢锋先后主持完成了20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攻克了多个土木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迄今为止，邢锋授权发明专利120余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



(图片：财新网)

2014年5月，邢锋离开深圳大学调往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任“一把手”，党政一肩挑。2016年2月，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2021年3月，又回到高校任职，任广州航海学院副院长。2023年，邢锋经历一系列显著的职业跃升，9月份，

他由广州航海学院副院长升任广州大学副校长，11 月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4 年 1 月，在当选院士仅仅 2 个月后，邢锋又被提拔为暨南大学新一任校长。

此次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是邢锋工作过的第五所高校，也是其首次担任本科高校一把手。暨南大学被誉为华侨最高学府，是统战部直属高校，而邢锋此前长期在地方高校任职，由地方高校调任部属高校担任一把手的情况非常少见。

再过 2 年，暨大即将迎来 120 周年华诞，对于邢锋来说，这是一个彰显个人才能的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凭借在土木工程学上的学术优势，或许邢锋能为暨大工程学的发展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帮助暨大进一步提升工程学，乃至整个工科领域的实力，在这个基础上在使暨大的综合实力得以提升。



## 周洪宇院长语录入选 2024 年百度指数最强的 21 位教育名家金句榜

“没有一种服装比教育名家的金句更合身，也没有一种装饰比教育名家的金句更迷人。”

金句，顾名思义，是指那些像金子一样高贵、有价值、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启示、能够激发人们思考和共鸣的句子。教育名家们的金句，不仅传递着作者的核心理念和时代思考，还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并产生着广泛和长远的影响。

2025 年 1 月 11 日，2024 年中国基础教育百度指数最强的 21 位教育名家金句榜发布，周洪宇院长语录入选。

关于教师，周院长认为：“教师要使自己阳光，给学生阳光，让大家共同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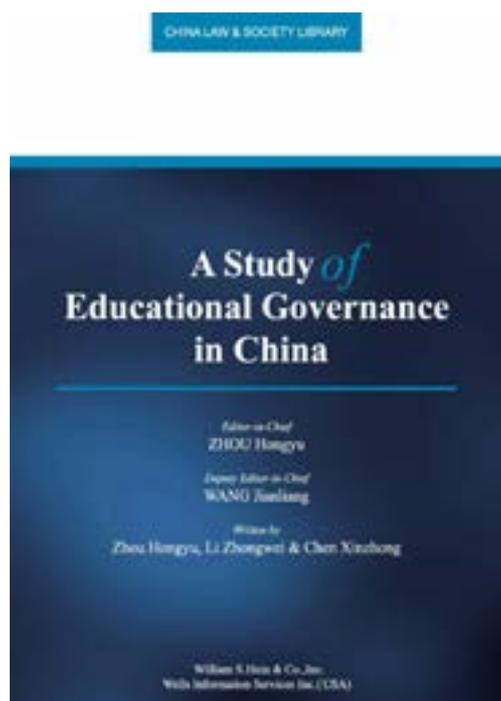
### 六、关于教师

17.“教师要使自己阳光，给学生阳光，让大家共同阳光。”



当代教育名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洪宇（百度指数133）

##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英文版正式在海外出版



由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所著的《中国教育治理研究》英文版正式通过 W.S.Hein 出版社在海外出版。W.S.Hein 出版社将本书列入了中国法研究专著系列，并已收录进入著名的 HeinOnline 法律数据库中的“中国法律与社会”文库（China Law & Society Library）中，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学术成果和中国优秀法律文化。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其中一种，该系列丛书由周洪宇教授主编，是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重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英文版已入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丛书此前还曾获得第五届湖北出版政府奖。

周洪宇教授曾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治理与教育政策研究，主编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全球教育竞争力研究丛书”“教育治理与智库研究丛书”“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等多套系列丛书，在教育治理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造诣深厚。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一书契合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为中国教育领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向全球贡献了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其英文版的海外出版，为国际教育界了解中国教育治理的理念、模式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窗口，有助于加强中外教育治理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mailto: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